

中美校际期刊

ISSN 2694-5932

IUCJ

中美能源贸易的未来——繁荣还是萧条？

柯博文和吴焕章

中美技术战背后的意义

白可杰

相互依存

第一卷 | 第一期

2021冬



《中美校际期刊》是一本双语的、半年度学术期刊。我们致力于为全球的本科生提供一个发表他们具有跨学科思维、高学术水平研究成果的平台。作为UCBRC的附属组织，《中美校际期刊》的核心任务是联结来自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学校的学生，在一起参与和促进“中美关系”相关话题讨论的同时，不断延伸与拓展对于全球性议题的交流。我们希望通过本刊加强公众对于中美两国国内以及国际事务的了解。刊物的内容包括讨论探究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各自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我们将秉持相互比较、相互参照的思路，去讨论包括安全、政治、文化、科技、经济和环境等领域的有关话题。IUCJ与诸多研究机构以及杰出的中美学者保持合作关系，并由此来秉持作为学术期刊的严谨性、高标准性。

The United States-China Better Relations Coalition (UCBRC)，包括《中美校际期刊》，全部是由慷慨的个人捐助者以及在中美两国同时有业务运营的机构所资助。UCBRC和《中美校际期刊》不接受任何来自政府机构和学术组织的资金支持。如果您对此政策还有任何疑问，请发送电子邮件至outreach@iucj.org。





中美校际期刊

IUCJ

第一期 | 2020年冬季

IUCJ 2020 编辑委员会

主编

罗星娜，布朗大学 18级

李成，布朗大学 18级

副主编

柯秋岚，哈佛大学 17级

周慧玲，中国传媒大学 17级

编辑

约翰，哈佛大学 17级

桂雪馨，清华大学 19级

徐乐，四川外国语大学 18级

沈吴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17级

杭明理，哈佛大学 17级

陈华中，斯坦福大学 16级

施怡聆，上海纽约大学 18级

隋湖心

运营总监

肖易菲，韦尔斯利学院 20级

苏雨珊，麻省理工学院 18级

视觉设计师

唐睿璟雅，塔夫茨大学 17级

李悦濛，塔夫茨大学 18级

目录

编者的来信 罗星娜和李成	1
关于相互依存	
进入勇敢的未知世界 许立奇	2
中美能源贸易的未来——繁荣还是萧条？ 柯博安和吴焕璋	3
中美技术战背后的意义 Jackson Barkstrom	10
Ashish Jha关于应对全球公共卫生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观点 杭明理	13
促进中国的技术发展 石倚川，施怡聆，安成龙，陈志欣，Peter Winston Michalak	15
增强环保意识：黄忠和史凯利因斯基谈论中美在气候变化上的合作 李燕妮	19
关系中美的全球事务	
贝加尔恐中症：对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威胁？ Alexander Naumov	22
中国的私募股权投资：监管制度对私募股权公司的影响 Hannah Bradford 和 Riley McKinzie	26
世界对老挝的亏欠 江映月	35
征稿	41
UCBRC Home Is...? 展览艺术品	42

编者的来信

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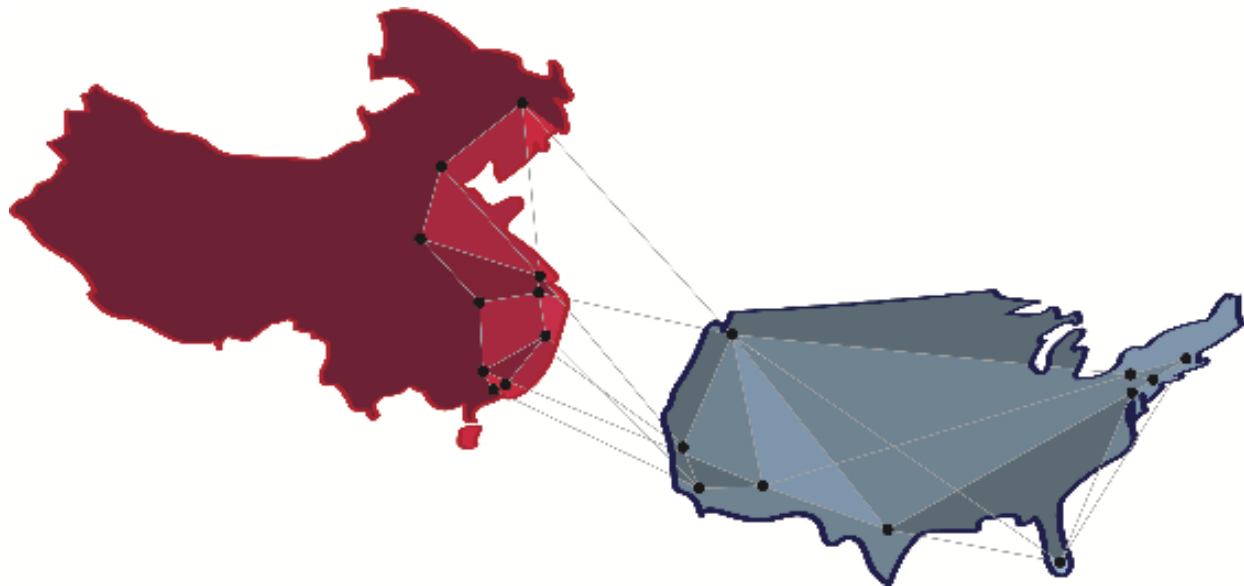
四十多年前，美国与中国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从此以后，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发展，成为了一个在国际舞台上具有巨大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国家。当今，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关系之一。然而，中美两国虽然是彼此最具有影响力的商业伙伴，但却视彼此为竞争对手，因此，当今的中美双方缺乏通过合作来解决共同的困难以及追求共同的梦想的空间。由今年的时事可见，在这个受到全球变暖的威胁以及新冠疫情的肆虐的时代，超级大国的合作对于解决危机显得更为重要，但中美关系却处在恶化的十字路口。

IUCJ(中美联合校刊)由UCBRC创立，致力于将围绕中美关系普遍的消极叙述推向积极合作及相互理解的发展方向。为此，该期刊的创刊号将以学生们对全球问题和外交政策的研究和看法为特色来重新审视当今的中美关系。作为一本由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共同完善发表的期刊，IUCJ将积极培育一股崭新的力量，来推崇相互帮助与理解的精神。我们的刊物将以双语的形式发布，更好的帮助世界各国人民进行跨大洋的沟通交流。

在当代的全球舞台上，保持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如果我们能及时走出当前描述中美关系的负面言辞和言论，把目光投向长远的未来，中美两方之间齐心合作的潜力还是存在的。我们诚挚的希望通过促进学生领袖和学者们之间的合作和交流，来栽培使中美关系在未来有所改善的种子。无论是在美国，在中国，还是在别处，我们相信年轻人的声音会为中美关系的积极发展以及全人类的福祉奠定良好的基石。

此致
敬礼

罗星娜和李成
主编
中美校际期刊



进入勇敢的未知世界

许立奇[1]

[1] 许立奇是2021届乔治城大学的学生。

2020年8月1日，我乘坐一辆Uber前往华盛顿杜勒斯机场。在和司机聊天时，我隐隐感觉到生活不会很快恢复正常——部分是考虑到全球性流行病的破坏性影响，但也是由于近期迅速恶化的中美关系。与此同时，电台也在播放新闻报道，国会大厦对参议员戴安-费恩斯坦公开赞扬中国的反病毒工作，及其主张美国学习中国进行了轰炸式的批评。如今，华盛顿的气氛对亲华情绪很冷淡。似乎对中国的正面评论会导致“抱熊猫”的指责。不同意、反驳、批评中国是美国新的政治正确，这两个国家的未来，就像挡风玻璃外的天气一样，阴雨绵绵，灰蒙蒙。

我的航班定于下午早些时候起飞。我将先在首尔降落，然后再到达我的最终目的地——中国。通常情况下，我并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通过转机到第三国来省钱，因为二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是一个如此艰巨的挑战。然而，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已经在许多领域造成了附带的后果，民航就是其中之一。两国航空局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是，在飞行垂。购直飞机票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很幸运，根本没有订到回家的航班。机票的稀缺，不仅是供不应求的结果，也是需求量激增的结果。中国人对美国是真的不自信，中国国家媒体频繁报道病毒病例统计和美国的抗议活动，更加深了这种不信任。数以万计有孩子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家庭紧急将孩子飞回国内。就像一些美国人把中国想象成邪恶的专制共产主义政权一样，很多普通中国人把美国想象成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国家，政府不重视公民的生命。回国后，我不得不反复向许多亲戚解释，美国的生活还是

很平静、很正常的——至少在我居住的华盛顿特区。可是我的亲戚们并不相信我的亲身经历。他们宁愿幻想一个被病毒折磨的混乱国家和国内的动荡。

双方的误解令我深感忧虑，因为它危及人民的信任——外交的基石。如果美中两国不再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友谊，未来将出现不可调和的关系破裂和冲突升级。一个既没有官方沟通渠道，也没有公共外交基础的未知世界，将伤害我们所有人。2003年，当SARS病毒肆虐中国时，美国慷慨地提供了援助。2020年，这两个强国之间弥漫着不冷不热的态度和有害的口水战，阻碍了合作，扼杀了共同战胜共同敌人的机会。

然而，对抗不应成为中美之间的新常态。历史告诉我们，敌意只会破坏共同成就的可能性。华盛顿和北京都应该反思和自问：我们要给下一代留下些什么遗产？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太过广泛，无法脱钩，武断的破裂只会严重伤害双方。两国必须以冷静的头脑和勇敢的心态分析近期的动荡。拥有冷静的头脑，才能从不同之处找到相似之处；保持勇敢的心，才能在不同之处达成一致。

1976年，当尼克松总统第一次向周恩来总理伸出手时，周恩来说：“您的握手是在世界最辽阔的大洋上进行的”。我们前辈的勇气融化了中美之间的坚冰，当前的双边关系也正需要相当的勇气来恢复理性。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勇敢的未知世界。在这个领域，不存在所谓的“灵丹妙药”。只有勇敢的精神和不懈的努力才能把我们引向更光明的未来。

关于相互依存：

在这个高度全球化的世界里，相互依赖已成为了当代社会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部分中的学生研究及叙事专注于交织于国家内和国家间的关系。

中美能源贸易的未来——繁荣还是萧条？

柯博安^[1]和吴焕璋^[2]

[1] 柯博安是2021届清华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

[2] 吴焕璋是2022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

摘要：虽然目前中美两国在能源领域的贸易额相对较低，但直到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前，美国还是中国增长最快的能源资源供应国。这是由双重因素带来的：美国扩大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以及中国成长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为了确定中美能源贸易的未来，我们将从中美两国的国内情况出发，分析目前在能源市场上的优势和不足，并利用这个已有的框架来讨论中美关系的持续破裂可能给两国带来的后果。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希望达到两个目标：第一是概述中美脱钩的潜在危害，并概述中美之间在能源贸易中存在的相互依赖程度，这依赖即使不存在于目前的情况中，也必定存在于将来。其次，我们希望勾勒出一系列可能的初始步骤，以建立一个既能考虑到促使中美分离、又能考虑到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因素的框架。

关键词：中美关系能源贸易；中美关系；脱钩；互联互通；中美贸易战；化石燃料；可再生能源

在线发布
2021年1月

参考资料

Cobb, Andrew and Huan-zhang Wu. 2021. "The Future of Sino-U.S. Energy Trade: Boom or Bust [中美能源贸易的未来——繁荣还是萧条?]." IUCJ 1 (Winter), 3-9.

两国的国内情况

中美关系的未来将是国际秩序中最重要 的 双 边 关 系 ， 而 其 重 要 性 尤 其 体 现 在 二 者 经 济 贸易领域的往来合作。中美经贸合作覆盖农产品、工业产品、高科技等多领域；其中与上述同等重要但往往容易被忽略的一大领域，是中美能源贸易——特别是从美国运往中国的化石燃料和从中国运往美国的可再生能源设备的贸易。之所以中美能源贸易具有重要意义，主要是因为两国能源供需结构具有互补性。目前，中国作为新兴的能源进口大国，需求量不断增加；而美国则正在经历从主要能源进口国到竞争性出口国角色转变过程。可以说，中美能源贸易合作具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为了更清楚阐明这一观点，我们将对中美两国的能源供需状况做出简要的分析和说明。

（一）美国的情况

1. 能源贸易角色过渡--页岩革命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几乎一直是主要石油进口国，即使在苏伊士危机、欧佩克石油禁运、伊朗革命和第一次海湾战争等重大石油危机中，亦是如此。，美国对外国进口石

油的依赖，使之与产油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贸易逆差；而为了保障其海外进口石油安全，美国则不断对这些国家进行军事介入。2000年初，美国开始转向加拿大、委内瑞拉等美洲产油国家进口石油，以降低其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性。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大多数经济体陷入衰退，导致商品价格大规模通缩，其中油价从120美元/桶跌至40美元/桶。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油砂居高不下不下的生产成本，对于诸如加拿大和委内瑞拉等国家而言，其所生产的油砂已经无利可图。然而，相较于各产油国而言，美国才刚刚开始开发自己的国内产品以替代进口石油。

2. 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暴跌

由于广泛使用水力压裂法（简称水力压裂法）开采页岩油，美国国内的石油产量在短短几年内就翻了一番^[3, p.126]。水力压裂法在开采石油的同时，还能顺带生产天然气，进而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天然气产量。的然而，页岩油开采也导致了天然气供应量过甚，进而导致天然气价格暴跌，以至于天然气市场完全崩溃；对此，天然气生产商会将富余的天然气交给相关公司来处理。即便如此，美国生产的天然气中仍有大约有一分之一的天然气在生产厂被当做有害污染物当场焚烧处理掉。

相较于天然气而言，原油市场则没有受到较大冲击——尽管页岩革命为美国带来了大量的石油供应，石油价格降也仅仅降低至30-60美元/桶这一区间。目前，美国页岩油的生产成本在40美元/桶左右浮动，这为无疑美国国内生产商从中盈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让消费者从低价中获益。页岩革命给美国带来了丰富油气资源，使之在降低其对非北美地区生产的石油依赖的同时，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带来了巨量的廉价天然气和石油。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少数国家能够保持在油气供应方面有利可图的地位（主要是中东国家）。

3. 液化天然气投资

相较于一般的油气供应，液化天然气(LNG)的情况则略为复杂。为了应对天然气供应过剩的问题，美国也试图将富余的天然气卖给有购买意向的国家。然而，天然气从开采端到消费端整个供应链是极其精密复杂，因为它涉及到高压和持续的储存，这意味着供应链在所有的端点都必须是完整的，而这在一个天然气已经饱和的市场中是十分罕见的。然而，自从亚洲国家开始改变其能源消费结构，从污染更严重的化石燃料（如煤）过渡到更清洁的天然气^[3, p.396]，并将天然气转化为液化天然气进行跨国长途运输后，这种窘境已经开始缓解^[3, p.93]。

而跨国长途运输则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以在全美各地建设从压裂现场到LNG加工厂的天然气运输管道。截至2019年，约有35%的天然气以LNG形式运输，而就LNG进口量来说，韩国和日本位居榜首。而近年来，日韩两国决定开始把美国作为LNG进口来源，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原因在于两国国内资源的缺乏和天然气本身的环保清洁性^[3, p.222]。

值得注意的是，在与美进行油气贸易的国家中，中国从美国进口的LNG贸易额上升最快。不过，近年来中美贸易战让两国能源贸易停滞不前。尽管如此，目前仍有大量的投资用于开发LNG美国太平洋沿岸的加工和出口工厂。考虑到天然气的长久供应，美国对LNG出口的关注度只会继续增加。

（二）中国的情况

1. 庞大的需求增长

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中国对能源需求量越来越大。然而，相较于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仍然对煤炭这一能源具有较高的依赖性。这可以归结于三个历史和现实因素：

a. 在80年代初的经济发展初期，中国除了燃煤电厂之外，还没有能力建设其他适当的基础设施。

b. 中国的城乡和东西部的分化，使其资本匮乏地区（农村和西部）无力投资建设高科技电厂，从而迫使居民不得不烧煤或使用当地低效煤电厂来保障能源需求。近年来，城市化率也才突破50%这一大关，而这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仍将有相当一部分人口生活在完全依赖煤炭的不发达地区。

c.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几处煤炭储备地，而且这些地区的煤炭非常容易开采。相较于煤炭而言，中国国内最近发现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除大庆油田外）则需要先进的技术才能开采。

因此，中国仍然只能将煤炭作为主要能源。诚然，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对其他能源进行了一些投资，但其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量超过了所有非煤资源的供应总和，并在2007年达到峰值；而其81%的能源来自煤炭。从2004年到2017年，中国的发电量大约翻了三倍，达到6310太瓦时，位居世界第一。虽然由于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中国对煤炭的依赖程度已经下降到66%，但按人均GDP计算，中国对煤炭依赖居高不下，并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环境污染。这表明，如果在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中无法逐渐摆脱对煤炭的过度依赖，中国很有可能成为全球碳排放量第一的国家。

2. 新技术的推进

通过对可再生能源的大量投资，中国已经成为可再生技术和基础设施的世界领导者，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中国水力发电产业。中国已经成功建造了许多水电大坝，其发电量能够满足全球20%的电力需求，这无疑有助于降低其对煤炭的依赖。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河流大坝建成，大坝地区洪水、水质变差等诸多问题也显现出来；同时，中国的水电产业市场正在接近饱和。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之一是向太阳能和风能过渡。

目前，中国是全球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发电机的主导生产国。根据IEA（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截止至2018年，中国生产了全球近60%以上的太阳能电池板——而最近中国新疆金风科技公司超越了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风力涡轮机制造商。考虑到中国以如此飞度进行了变革，最重要的是能建立廉价的可再生基础设施，这些进步令人印象深刻。当太阳能和风能开始在西方国家兴起时，主要的批评针对的是开发、生产和安装所需的巨大初始资本支出。但自从2008年前后中国向这两个领域大量投资以来，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的价格都被削减了，其中太阳能发电板的价格下降了80%。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成功地利用其大量的国内资本和生

产能力，彻底改变了可再生能源市场。这不仅对其中国自身，乃至对整个世界都是切实可行的。与此同时，由于目前太阳能和风能的自然条件限制、技术缺陷等问题，中国整体能源消费结构在短时间内过渡到以太阳能和风能为主则并不可行，但其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已经取代了很大一部分的煤炭消费。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无疑为中国缓和国内能源供需矛盾和拓展可再生能源技术出口市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

崩溃的系统—失去的机会

(一) 一个可能让整个系统崩溃的挑战

1. 软脱钩

所谓中美关系软脱钩，类似于2017-2019年中美贸易战—中美两国各自采取高关税、制裁和国内补贴等策略，以促使贸易朝对各自更有利的方向发展。根据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结果，美国似乎赢得了贸易战——中国同意在未来3年内增加600亿美元的能源采购。然而，鉴于新冠疫情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这一贸易协议中的条款在未来三年内得到满足的希望似乎越来越渺茫。因此，新冠疫情之后中美之间极有可能进一步软脱钩。中美两国已经开始在技术领域（如互联网连接和5G技术）脱钩，而其对中美关系乃至全球的损害将在未来进一步展现。现在的问题在于，这种脱钩是否会永久性的，以及会造成多大的损害。

2. 硬脱钩

硬脱钩方案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后提出的。作为对中国政府对美国不满的回应，特朗普威胁要切断两国之间的所有贸易；然而即使在当时看来，这也是一个完全不可能的情况。不过，随着国际社会对疫情发源地、香港动乱、中国在太平洋的扩张等高阶政治问题的争议白热化，中美关系硬脱钩也很有可能提上日程。

虽然脱钩造成的损失程度难以量化，但其对能源合作领域的影响无疑将是灾难性的。一方面，美国已经成为中国能源进口增长最快的来源国；另一方面，美国的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中国廉价的太阳能和风能基础设施，以进一步推动使得可再生能源在页岩革命时代的发展。如果中美两国不能最终在上述高阶政治问题上协商出一个长期有效的解决方案，中美硬脱钩则极有可能发生，而其后果无疑将使中美关系走向衰败。鉴于美国现任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近期对中共治国理政的评论，如果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看法成为主流，硬脱钩则越来越有

可能成为现实。

3. 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崩溃

鉴于目前情况，中美之间角力可能产生的最坏结果是当前国际秩序的崩溃。美国智库斯特拉福（Stratfor）前地缘政治分析师彼得·泽汗（Peter Zeihan）已经详细说明了这种未来。泽汗声称，当前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秩序是全球贸易自由和有保障的准入、相对较低的关税以及自贸协定存在的唯一原因。这是霸权稳定理论的延伸——该理论认为，只有国际秩序在全球霸权维护的情况下，各国才能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美国在二战后从布雷顿森林协议开始建立了这种秩序，不仅使任何希望和美国合作的国家都能获得全球资本和美国市场，而且使美国能够利用其无与伦比的海军来保护全球贸易。虽然地缘政治专家普遍认为，我们所有的全球贸易都是由于美国在二战后决定建立这样的秩序才得以实现的，但泽汗认为，这个世界秩序只有在美国积极参与这个体系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他认为，这个秩序的问题在于，美国已经看不到这方面的利益 [3, p.12]。

泽汗认为造成美国这样的认知主要有两点原因。首先，所有国家都在努力使自己的国力最大化，而美国的相对国力最大化就处在一个非新自由主义的世界里。这是因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具备以下所有优势的国家：强大的地理边界、现象级的内部地理环境、良好的联盟网络、稳定的人口结构；而其他国家不具备这些优势。通过维护当前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美国让那些原本在现实主义框架下无法发展的国家享受到了相互依存和贸易的好处，从而增加了它们相对于美国的国家实力。

其次，曾经在美国安全保护伞下的国家在冷战后期后开始挑战美国的霸权。而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并不会花费额外的精力去遏制其他国家对美国主导的秩序的挑战，而只会退而求其次，就像美国从建国到一战期间以及战争间歇期一样。同时，泽汗也对中国做出了分析——中国依靠新自由主义体系来确保资本为其经济提供资金（而其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具有较低生产率的劳动力与较低效率的农业和制造业），并确保粮食和能源资源来支持如此庞大的人口和经济。如果没有美国领导和维护当前的全球秩序，美国将进一步退缩到孤立状态，从而导致中国进一步陷入不可持续的境地。

(二) 美国—油气资源巨额浪

1. 能源过剩和出口难题

目前，美国仍为其油气能源过剩问题所困扰。页岩热潮导致油价暴跌，天然气产量过剩，

这显然有损美国油气生产商的利益。然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与中国——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进行贸易的情况下。如果中美两国脱钩后不再进行贸易，美国能源市场将面临如何处理其过剩能源的巨大难题。在未来数年中，全球整体能源需求只会继续上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的增长和能源结构转型），从而导致能源价格（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上升。而如果全球最大的油气生产国不卖给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这将会造成全球油气能源市场的断裂，因为美国的油气价格会因为失去中国市场导致的消费需求下降而下降，而全球油气价格会因为中国需求的增长和美国对中国供应的流失而上升。这也许对美国消费者和部分跨国公司较为有利，但对美国能源企业无疑是极为不利的。

由于石油生产利润率的降低，美国石油生产商的损失将是十分显著的。而对于已经出现产量过剩的美国天然气行业来说，拒绝中国进口其天然气意味着更多天然气资源浪费。否则，今天运往中国的天然气就会被烧掉，使问题更加严重[4, p.165]。

然而，最大的变量在于美国政府是否愿意继续执行目前的能源政策。目前，美国认为自己正在向主要能源出口国转型。正如过去中东国家发现其原油有利可图一样，美国也注意到了其未来在世界能源市场的无限商机。然而，如果这些利润因中美脱钩而被明显削减，美国可能不会愿意以承担资源开采所造成的环境问题为代价而积极开展能源出口贸易。这可能会为美国经济带来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并因需要重新调整而导致潜在的经济停滞。

2. 可再生能源的困境

对美国而言，最严重的问题可能在于由于不再与中国合作开发可再生能源技术而承受的潜在损失；而这是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过去几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制造的商品征收了报复性关税，尤其是自2018年开始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征收关税，与此接踵而来的可能是对出口到美国的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发电机征收关税。理论上，美国仍然可以发展自己的工业生产技术以降低从中国进口产品的需求。然而，众所周知，在美国工业产品制造生产就需要付出高昂成本，尤其是精密复杂能源利用设备的生产和操作（人工劳务）成本太高。因此，尽管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等少数几个州可以转向以水力作为主要电力来源的能源结构，但美国大多数州仍以化石燃料为主要能源。在同时面临较高的可再生能源自主开发成本和廉价的化石燃料的情况下，美国可能仍会并将长期主要倾向于后者，而这无疑将阻碍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能源结构转型。

（三）中国——动荡与短缺并存

1. 缺乏合适的需求满足者

中国(以及几乎所有东亚国家)在进口石油过程中面临的一大地理阻碍因素在于其无法直接进入产油区；即使是诸如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距离最近的陆上生产国，也需要通过长长的管道，穿越人口稀少、地形崎岖的地区，才能够到达运输目的地——如新疆的天山山脉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因此，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要支付高昂的石油进口溢价。而如果中美两国进入脱钩期，这种情况将更是如此。目前中美贸易的一个好处是，中国有更多的进口选择。不过，随着美国作为油气能源出口国地位的迅速上升以及其极其丰富的油气储量，中国也难以完全拒绝与美国能源贸易的可能。而如果在未来将美国排除在外，中国的海外能源采购也将会遇到重重困难。随着油气进口溢价持续增长，中国可能会进一步开展与中东国家紧密能源贸易，因而或将不可避免地卷入复杂的中东地缘政治纷争中去（而这与中国不干涉的外交政策理想相冲突）。此外，由于中国拒绝从美国进口石油和天然气，随着中国购买市场与世界市场的脱钩，国际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这将迫使中国向内寻求解决国内供需矛盾的办法。

2. 环境恶化或社会不满

中美脱钩给中国造成的一大难题在于，如何处理好石油天然气自给和国内社会利益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如前所述，中国将很难依靠可再生能源来满足其巨大的能源消耗，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很可能来自于中国自己的化石燃料资源。

中国如果继续维持其煤炭主导型的能源消费结构，无疑将会继续受到来自国内外舆论的尖锐批评。而人民群众可能会对政府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处理效果更加不满，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人民群众将承受环境污染对身体健康的严重危害。根据相关数据估计，空气污染可能会导致全国每年有100多万人过早死亡，由于潜在的工作时间损失而对经济造成破坏，并相应地导致人民医疗支出的增加。在农业方面，煤炭造成的污染估计会破坏2000万吨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造成严重的粮食污染问题。在目前的污染水平下，每年共损失约2670亿元人民币。虽然中国的能源消费在未来还将继续增长（即使不考虑全球贸易的任何变化），但预计到2050年，煤炭将占到中国全部能源发电量的30-40%。如果中美脱钩不断升级，中国可能别无选择，只能更加依赖煤炭。

诚然，中国有机会发展自己的油气能源产业。中国有足够的油气储备来满足未来的能源需求，但选择国内开发将导致更大的生态环境不稳

定并引发社会利益冲突。试设想，如果北京选择在四川实施水力压裂，对环境的破坏和进而对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影响，这可能将造成中央与地方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之间巨大的张力。而新疆的问题则会更严重，因为水力压裂的环境后果很可能破坏相对一部分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环境（尤其是生活在生态环境脆弱的草原戈壁等过渡地带的居民）。如果中国转而利用其巨大的油页岩储量，尽管有可能获得丰富的油气资源，但由于地表带状开采和需要建立地表尾矿池，大规模的生态破坏将使新疆广大地区无法居住；过去在加拿大的阿萨斯卡油砂地区有类似先例，该地区因油气开采而遭受极端的空气、土地和水污染）。如果中国不能确保全球能源供应，可能会被迫陷入污染城市和电力供应匮乏的两难境地。

联合的未来——潜在合作契机

（一）合作模式的构建

在地缘政治角力不断、中美脱钩加剧的潜在趋势下，如何为两国进一步开展能源贸易合作构建有效、务实的框架，当前一个重大难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两国要实现能源合作就得完全从零开始。

事实上，自中美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中美两国就在能源方面进行了项目合作，并达成了一系列的贸易协议。例如，邓小平和卡特在1979年签署了“科技合作协议”，希望发展中国自己的石油开采和炼油能力，否则没有美国的技术是不可能的。过去40年的中美能源合作关系主要集中在与能源相关的技术转让、能源合作的制度化以及与能源相关的减排方面。然而，中美能源合作模式需要与时俱进，因为之前的模式并没有考虑到近年来美国在能源出口方面的新推进，以至于快赶上沙特和俄罗斯等传统能源出口国。而美国对于对华能源出口的愿景也在中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有所体现——协议要求中国在2020年实现购买价值超过250亿美元的能源产品。考虑到截至2020年6月中国仅从美国进口了价值约12.9亿美元的能源产品，这一要求似乎完全不切实际。在从美购买能源产品进口额尚不足的情况下，中国是否有能力履行能源贸易协议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同样值得考虑的问题是，是否可能有一些替代现有贸易协议的办法来绕过协议中要求的这个不可能的购买量。

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中美两国在能源合作领域确实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两国都严重依赖化石燃料生产能源，而化石燃料的排放又会造成大量的环境污染，以及温室气体和有毒化学物质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最理想的情况

是，中美两国可以利用目前的竞争优势来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中国有较强的能力制造廉价的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和产品，而美国有丰富的页岩气和石油储量（储备地区基本上远离人口密集地），并有一整套高效的压裂技术，使美国能将污染主要控制在开采现场。这或许表明，如果现有的贸易框架加以微调，中美双方的要求则有可能得到满足。

不少历史证据表明，中美进一步合作的潜力巨大。而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在亚太能源合作综合机制下，中美两国开展了清洁能源开发和能源技术转让等广泛的实质性合作[16, p.157 - 73]。两国之间真正缺乏的是它们对能源合作所产生的潜在的利益共识。而由于双边紧张局势的升级和新冠疫情的长期存在，这种利益共识的达成也越来越困难。在此，若能勾勒出中美未来贸易互补合作的图景，特别是涉及石油、液化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的合作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或许有助于让中美两国回归互利共赢的能源合作传统。

（二）效益

1. 中国—环境

毫无疑问，中美能源双边合作将在环保领域产生巨大的效益。在这一模式下，中国将按照2019年12月签署的现有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规定，从美国进口大量的液化天然气。天然气尽管是一种化石燃料，但其燃烧时排放的二氧化碳水平远低于黑煤，因此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更为清洁的能源。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渴望解决由煤炭密集型发电厂造成的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因为这些发电厂会产生大量的污染物。LNG进口量的增加可能会成为中国能源结构调整的催化剂，使中国逐步降低对煤炭的严重依赖，帮助中国向更环保的能源转型。这也与目前中国政府关于经济发展规划，特别注重可持续性、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等政策方针高度契合。

中美合作的另一个好处在于，中国将有可能获得大量寻求基础设施投资的美国资本。虽然中国已经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项目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但中国仍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西方对中国能源部门的投资（特别是开采和制造技术以及管理经验方面），尤其是在清洁化石燃料领域。如果新的全面贸易框架谈判达成，其中一个关键部分则包括西方对中国及周边地区能源生产（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的投资。这些投资很可能成为促进中国能源结构向更绿色、更可持续转型的重要催化剂。

2. 中国—能源安全

能源安全一直是中国国家安全和战略计划的中重中之重。由于众多人口与经济快速增长，中

国多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净进口国（主要是化石燃料）和能源消费国。而由于部分能源出口国某种程度上控制了中国经济命脉的一部分，作为净进口国的中国能源安全也随时有可能受到外部势力的威胁。

这也意味着，在能源出口国与中国外交关系的低谷期时，这些国家可能会将中国能源依赖问题作为与中国博弈的一个重要筹码。中国油气的出口国主要集中在中东和亚太地区，包括沙特、伊拉克、卡塔尔、俄罗斯和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大多与中国有着广泛的共同经济利益。然而，随着中国作为一个区域乃至世界大国逐渐崛起，这将可能改变长期存在的国际秩序，因而使得其周边的地缘政治格局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战略目标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其周边国家将对与中国的合作持更加谨慎的态度。反而观之，中国对这些国家也可能存在自己的顾忌，尤其体现在能源安全方面。鉴于中国对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的较大依赖，其很可能会考虑通过分散能源进口来源来减少来自部分特殊国家的潜在威胁。以其近期中俄关系为例，众所周知俄罗斯是中国在军事、能源生产等多个领域的主要战略伙伴。然而，考虑到俄罗斯长期向印度军队提供先进的武器装备，以及近期中印边境军事对峙，中国很有可能将提高其警惕，并重新评估或至少微调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尽管中国与俄罗斯总体上关系融洽，但鉴于俄罗斯历史上对中国领土的入侵和吞并的行为，俄罗斯在必要时刻仍有可能采取损害中国利益的行动（也许是以某种秘密的方式）。毫无疑问，能源安全是中国在东亚地区地缘政治长期战略规划中的重要组成，因此，中国不可能仅仅依靠几个国家作为进口来源，特别是那些对中国地缘政治、能源安全具有潜在威胁的国家。

然而，如果能够进一步开展与美国的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可以缓解目前过度依赖少数国家进行能源进口的窘境。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可以通过这样的途径使其自身的能源组合多样化，从而减少对部分能源出口国产生像美国对这些国家一样因地缘政治变动而产生的依赖。需要明确的是，美国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并在全球拥有无与伦比的技术、经济和军事影响力。这一事实并没有因特朗普政府退出多个国际机构、及其国际霸权地位相对降低而改变。这项合作不仅能够使中国的能源组合多元化，也将很大程度上促进当前中美关系的缓和——推动中方履行其购买承诺，并使美国的贸易逆差下降。这对中国进入美国掌控下的的航道，如马六甲海峡，等关键的油气资源海上运输要道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加强与美国在能源贸易上的合作无疑是缓解中国目前面临的潜在地缘政治威胁的有利策略。

3. 美国贸易逆差

美国现今已陷入了与中国在贸易协议上的错综复杂的僵局。困扰美国多年的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是：美国与一些国家的贸易逆差不断增加，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则与中国的贸易有关。自1985年以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断增加；截至2020年7月，美国对华的贸易逆差总额已超过1630亿美元。同时，中国也一直深陷与美国的贸易争端中，尤其体现在高新技术转让方面。尽管如此，贸易主要冲突焦点将不太可能延伸到能源贸易领域。这也为建立实质性的、积极的能源贸易合作创造条件。美对中国的天然气和石油出口可以建立在美国页岩气的过剩和中国对液化天然气需求增加的背景之下，而这将大大缓解与中国的贸易逆差。

4. 美国—环境

虽然美国拥有众多的环保创新人才，并在高科技方面很先进，但在处理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上仍然面临着挑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环境污染。虽然美国处理的水污染和城市烟雾的程度不如中国等国家，但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美国仅次于中国。因为美国大部分的主要能源都是化石燃料，如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其总量占其经济中能源利用的近80%，其能源结构对气候的影响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天然气和其他化石燃料能源的过量生产可能会阻碍美国能源结构向更可持续和环境友好的阶段过渡，因为这些能源仍将作为主要经济生产活动和日常消费中电气化的主要选择。

中美能源合作的另一个可能领域在于可再生能源和相关技术的开发。中国具有在建造太阳能和风能基础设施和设备成本上的相对优势，这将成为美国替换其廉价的化石燃料的有利选择。此外，中国很容易获得生产设备的关键原材料，这意味着向可再生能源的有力过渡必须来自于对国内研发的大力投资。可再生能源公司或与中国合作。虽然美国可能会寻求发展其自己的可再生能源企业，而由于来自国内环保组织的压力越来越大，调整能源结构的需求越来越紧迫；而与中国开展紧密的可再生能源合作无疑将是对美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巨大推动力。

5. 相互稳定

从长远角度来说，两国将从这样更大程度相互依存关系中获得的好处。尽管两个非自然盟友之间的高度相互依存听起来有悖于直觉，因为根据历史上的国际关系模式，这样的关系常会被视为国家安全上的潜在威胁。以日本对美国在橡胶和石油上的依赖为例，这样的依赖关系迫使日本要么改变其侵略性的外交政策，要么承担代价

极高的禁运风险——这样的处境最终推动了日本向东南亚采购橡胶，并最终导致帝国的过度扩张和衰败。按照这个逻辑，中国应该主要发展自己的能源实力，但是自二战后世界形成起来的相互依赖的国际秩序关系已经造就了人类历史上最和平的时代。如果对现在脱钩现状有唯一能够确定的一点的話，那就是全面脱钩将减小经济损失带来的潜在战争可能。在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上的相互依赖将有助于控制双边关系中的军事安全冲突——因为两国都会担心因持续紧张形势带来的经济损失。

结论

基于上述分析，中美脱钩无疑将对两国能源领域的未来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但倘若中美脱钩能够有所缓和，能源领域发展则将会有更广阔的前景——中美能借助在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解决许多无数看似与能源领域无关的国内问题。由于篇幅有限，且经济脱钩的政治背景太过复杂，因此本文无法全面详细地划分。因为这样过于复杂的政治背景也很有可能推动脱钩，避免这种戏剧性地缘政治事件的关键必须在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框架中找到。

从现实主义范式看中美国内形势，问题核心在于维护国家稳定。相应地，中国必须找到相应途径来解决其在资源紧缺上的问题，这将使得中国在不安全的资源进口和加大国内开采资源之间做出选择。同时，美国必须面临其向成为世界最大能源生产国和出口国转型过程中将带来的挑战。面对国际上的诸多共同问题，中美两国都将为为了本国的利益而寻求两者间的相互依赖。

中美关系改善的关键即在于此。尽管两国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利益的分歧而几乎脱钩，但由于其国内诸多利益因素的考量，两国未来的命运紧密相连。为了实现稳定和繁荣的未来，两国需要在包括能源在内的等诸多领域加强互联互通。中美两国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看似相互脱离的时期，但实际上两国的未来紧密相连。因此，相比于现阶段的脱钩来说，两国未来脱钩才是真正最值得担忧的地方。

目前，第一阶段协定的无疾而终（主要受到新冠疫情影响），而第二阶段的贸易协定看起来几乎不可能实现。但就对于双方政府中希望扩大合作并实现这样看似显而易见的相联系关系的人来说，新的全面贸易协定应该集中解决两国现有的国内问题。两国首先应该摒弃“打赢贸易战”的观念，并通过美国对中国的稳定能源供给、中国与美国切实重建更加公平的能源供应链的形式来解决。

参考文献

- [1] Peter Zeihan, 缺席的超级大国：页岩革命和没有美国的世界 [The Absent Superpower: The Shale Revolution and a World Without America]. Austin, TX: Zeihan on Geopolitics, 2016: 11.
- [2] 油砂、天然气和油页岩市场增长. 能源商业报告, 2013: 215.
- [3] Stephen Stapczynski. Trade Deal Could Propel U.S. to Top of China's LNG Supplier List. Bloomberg News, 2019-07-12.
- [4] 中国电力. 中国的能源足迹如何变化?.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中国电力项目, 2019.
- [5] Dominic Chiu. The East Is Green: 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 外交政策新视角, 2017(13).
- [6] 中国简报. 中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如何解读该协议. 德赞世良律师事务所中国简报, 2020.
- [7] Peter Zeihan. Disunited Nation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Inc., 2020: 16.
- [8] Robert Gilpin. 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86.
- [9] Peter Zeihan. The Accidental Superpowe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American Pre-eminence and the Coming Global Disorder. New York: Twelve, Hachette Book Group, 2014: 99
- [10] Nichola Groom. U.S. Solar Group Says Trump Tariffs Killing Jobs. 路透社, 2019-12-03.
- [11] Tilak Doshi. The "Asia Premium" in Crude Oil Markets. Routledge, 2014-01.
- [12] James Griffiths. China Has Made Major Progress on Air Pollution. Wuhan Protests Show There'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CNN, 2019-07-11.
- [13] Y. Gu et al. 空气质量、公共卫生、作物生产和经济成本 [Impacts of Sectoral Emissions in China and the Implications]. 环境研究通讯, 2018 (13), 第8期.
- [14] Gaye Christoffersen. 《US-China Relations in Asia-Pacific Energy Regime Complexes》, J. F. Blanchard 等编: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Sino-US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157-73.
- [15] 徐牧宇. 2020年上半年中国仅完成5%的中美能源贸易协议. 路透社, 2020-08-04.
-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经济贸易协定. 2020-01-15
- [17] 天然气与煤炭对环境的积极影响: 压缩天然气输系统. GASVESSEL, 2020-09-10. <https://www.gasvessel.eu/news/natural-gas-vs-coal-impact-on-the-environment/>
- [18] Philip Andrew-Speed and Sufang Zhang. China as a Global Clean Energy Champion.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9:1-2.
- [19] Vivek Raghuvanshi. India Accelerates Weapons Purchases in Wake of Border Clash with China. Defense News, 2020-07-06.
- [20] 美国人口普查局. 对华贸易商品. 2020-09-03. <https://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5700.html/>.
- [21] 美国能源信息署. 美国能源事实解释. 2020-05-07. <https://www.eia.gov/energyexplained/us-energy-facts/>.

中美技术战背后的意义

《近代中国：金融合作以应对可持续发展挑战》，55-64

白可杰[1]

[1] 白可杰是2021届布朗大学数学专业的学生。

摘要：当前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主要围绕着争夺技术霸主地位展开，这场技术竞赛提高了所有投资者的风险，并要求他们进一步分析潜在的影响和机会。虽然中美间的技术竞赛可能会阻碍中美间合作并减缓全球气候变化进程；与此同时，它也将将在技术、清洁能源和生物技术等领域产生创新的热潮，并且拥有应对像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爆发那样流行病问题的快速解决方案。

关键词：技术开发；中美贸易；清洁能源；生物技术

本文经许可转载自【施普林格·自然杂志社】：【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杂志社】【中美技术战背后的意义】作者【白可杰】【© The Author(s)】(2020)

在线发布

2021年1月

参考资料

Barkstrom J. 2020. "Implications of the Technology Race." In Modern China: Financial Cooperation for Solving Sustainability Challenges, 55-64. Palgrave Macmillan, Cham.

什么是技术战？技术战的重要性是什么？

现阶段主要围绕技术霸权展开的中美间的冲突意味着投资者们将面临的更高风险。因此，对这场技术战分析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这一章节将分析中美两国间的竞争与依赖关系、衡量两国技术战范围的变化并指出中国在未来可能会出现投资机会。

简而言之，如果中美技术战争持续升级，许多中国企业将会面临困境。这也将给中美间合作带来负面影响，例如两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将会受到重挫。然而，在两国相互较量的同时，这场技术战争也很有可能在信息技术、清洁技术、生物技术等方面带来重大的创新及突破。投资者将在增进中美合作中扮演关键角色，同时他们也可以利用技术战中的科技创新带来历史的新机遇。

竞争与依赖：中美关系及变化

中国和美国不仅是彼此的最大竞争对手，同时也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间激烈的竞争加之贸易上的相互依赖使得中美关系变得愈加复杂。习近平主席将这种竞争与依赖共存的关系称为缠斗。这个比喻的恰当之处在于，中美关系一直在冲突和合作之间保持平衡。以贸易为例，两国之间的贸易政策在开放贸易与保护主义之间摇摆不定。

竞争

随着中国与技术领域的突飞猛进，中美之间竞争的利害关系也正不断上升。因为美国希望在中国面前保持其技术和经济优势，因此其通过采取限制中国获得某些美国技术、在经济上施压的方式来保持美国的优势。

出于国土安全和经济方面的考虑，美国政府则顾虑中国会提前获得更先进的技术，尤其是在半导体或网络安全方面。这种竞争态势对两国都会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对美国而言，由于目前缺乏足够的贸易与合作，其经济增长正变得更加缓慢。对于中国而言，因为其目前仍依赖于美国和全球市场的供应和融资，美国施加的经济压力无疑使其也受到了重创。

依赖

在保持激烈竞争的同时，两国之间也有着相互依赖，而这依赖关系主要建立在两国的不同优势上。中国有廉价的制造业，快速发展中的消费经济，对手机和互联网相关产品与服务的高需求以及大量的理工科人才。美国则拥有领先的技术，成熟的消费经济以及进入全球经融市场的良好渠道。

两国借助其比较优势可以从跨境贸易和投资以及合作机会中获得了可观的收益，这也给两国发展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相互依赖。美国目前依靠中国和其他国家将制造业的成本降到最低，而中国目前依靠美国及其他国家来获得最先进的技术。

中国的依赖和风险：海外技术供应及融资

目前，因为中国在先进技术领域仍然依赖全球供应，从而使其极容易被美国政策所影响。例如，美国禁止华为在其手机上使用谷歌的安卓操作系统，从而使得华为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并不得不开源设计自己的系统。

半导体（或集成电路或计算机芯片）是中国供应链中风险较高的产品。因为半导体与电话，计算机，智能汽车等的核心处理有着密切关联，没有半导体就意味着无法制造此类设备。这些芯片则是中国的致命弱点，因为唯有美国、韩国、日本和欧洲等区域有能力设计和制造最先进的半导体（即微处理器）。中国需求占全球半导体需求的半数之上，但中国本土的公司却只能满足约百分之三十的需求。

中国目前已经制定了未来大规模半导体制造的计划，但专家表示，由于缺乏人力资源等因素，这些规划可能需要十年及以上才能看到成效。从短期来看，中国仍需要依赖全球半导体供应来整合大多数技术。与此同时，中国公司通过大量储存国外半导体以减轻来自此依赖的风险，但中国仍然极易受到全球半导体供应变化的影响（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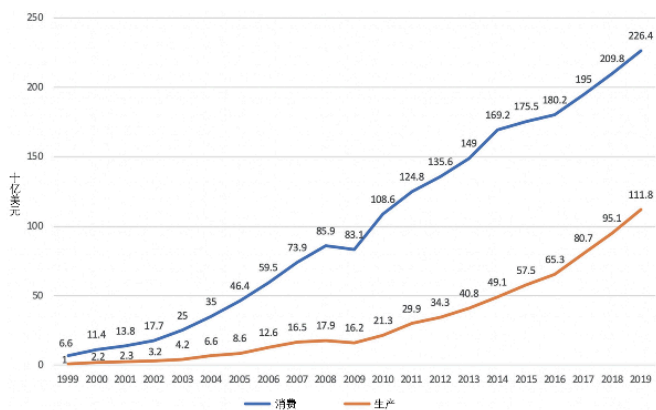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半导体消费和生产值。（PwC, “中国在半导体行业的影响：2017更新”，2017年11月。2015年后的数据为预期）

除了半导体等外来技术，中国还依靠由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来获取资本和开展国际业务。这个话题虽不在本章所讨论的范围之内，但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可能会利用其金融霸权使中国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而中国很可能会力争摆脱其词方面的依赖。

美国的依赖和风险：中国制造

大量的美国公司使用且依赖于中国的制造商。然而，将制造地从中国转移到别处则需要数年的时间。以苹果公司为例，其约百分之五十的供应商都在中国本土。将其中国供应商转移至别处对苹果而言意味着大量损失的市场份额。从中期来看，许多美国公司将持续依靠中国从而在全

球范

围内保持其业务和竞争力。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所控制的稀土元素供应对美国而言则不是主要风险。有证据表明，中国限制稀土元素出口只会提高消费电子产品的价格。美国既可以减少稀土元素的使用，也可以提高其稀土元素的生产，而中国却很难减少半导体的使用或生产出最先进的半导体。

中美技术战的现状及未来趋势 美国和中国的竞争目标

美国希望在中国面前拥有全面的技术和经济优势；作为回应，中国则希望建立一个接近甚至超越美国的独立技术生态系统。

一场专注于技术和经济的竞争

当前中美之间的冲突正围绕着技术和经济展开，这是一场关于顶尖技术和经济生态系统的冲突。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纽约时报》近期的社论中称中美关系为“新冷战”，但截至目前，这个冷战的比喻似乎只增加了中美间相互挑衅而缺乏实际意义。尽管有人可能会争辩说，中美之间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可能利用这种冲突来谋取政治利益，但从美苏冷战的水平来看，目前的中美冲突并不是一场政治冲突。

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于技术战至关重要，因为信息技术可以使该国获得相应“被依赖”的优势。以5G为例，中国是开发和监管5G的全球领导者。华为通过与不同国家在5G行业标准方面进行合作，使得其能以低于任何竞争对手的价格生产领先的5G技术。

尽管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华为凭借其明显的竞争优势仍然获得了全球各个国家的合作。中国可依赖的优势在于拥有华为网络的国家需要依靠华为来执行和进行通信。尽管美国持续施加了很多压力，但许多国家仍依赖于华为的网络体系。同时，中国的某些行业也持续依赖于国外半导体供应。相对于中国，目前美国仍然拥有更多“被依赖”优势。

中国的长期独立性及投资风险

目前，中国正在追求长期的技术独立，包括制造先进半导体的能力，而这些措施可能会给中美间的竞争以及投资带来更大的风险。尽管如此，一些行业专家仍认为中美关系将会得到改善。2019年11月，《财富》杂志在广州举行的全球技术论坛中有很多乐观的声音，其中一位中国教授说，整个中美冲突源于误解。然而，技术战可能也源自误解，但冲突也有可能持续加剧。

一个自我依赖的中国可以实现与西方脱钩，

发展自己互联网结构，城市结构，网络安全形式等并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这种脱钩将同时增加政治风险和机会。脱钩会增加风险的原因通常有两个：第一，脱钩会导致双方之间的交流减少，而较少的交流会增加误解和发生冲突的风险。其次，在某些情况下，脱钩使一方有机会支配另一方而不会带来负面后果。举例来说，如果竞争对手A和B的超级计算机的研发渠道完全不同，并且A开发的超级计算机尤其强大且领先于B数年，那么A可能会在不产生后果的情况下破坏其竞争对手的计算机基础设施。然而，中美脱钩也带来了更多机会。投资者可以结合“中国模式”和“美国模式”得到最佳发展，并创造和增加重要的价值。实际上，随着两国合作的减少，未来协作所蕴含的潜在价值会不减反增。

如果可以持续实现自给自足及技术独立性，中国可能会与西方更全面地脱钩。支持脱钩的证据包括历史上中国对其独特的发展模式的重视。例如在2001年，习近平主席发表了一篇讨论中国的发展经济学的文章，中国方面的专家安德鲁·巴特森（Andrew Batson）说：“这篇文章明确地说明中国的模式将不会也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融合”。此外，中国目前正将其互联网审查和监管模式出口到其他国家。反对中美脱钩的原因包括中国企业所面对的大量国际机会，尤其在欧洲，中国已经拥有完善的商业网络。我们认为，中国将努力做到两全其美，假定当前中国领导战略延续，中国会在思想独立和经济机会之间寻求一条平衡的道路。

中国的创新策略与行业前景

中国的自力更生和全球领导力创新战略

中国的创新战略通常以政府对特定行业的干预为目标，并且侧重于：（1）通过半导体制造等举措发展中国的自我依赖力；（2）发展中国的全球领导者地位。通过支持全球重要的技术（即华为受到的直接或间接的政府支持），或通过支持全球不发达的技术，如清洁能源或电动汽车。中国的政策着重于实现自力更生和实现全球领导地位。自2006年开始实施以来，中国一直在加大支持这些发展政策。

必须注意的是，中国的创新政策不仅关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重点技术领域。它还将延展到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和智慧城市等没有全球主导地位公司的不发达行业，以使中国公司在世界其他地区具有竞争优势。例如，领先的可持续技术可以帮助中国公司在注重可持续发展的欧洲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Alper, Alexandra. 2019. "U.S. Finalizing Rules to Limit Sensitive Tech Exports to China, Oth-

- ers." Reuters, December.
- Batson, Andrew. 2019. "What Xi Jinping Thinks About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drewbatson.com, December.
- Baxter, Tom, and Yao Zhe. 2019.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What Ideas Are on the Table?" Chinadialogue.com, July.
- Bloomberg. 2019. "China's Curing Cancer Faster and Cheaper than Anywhere Else." December.
- Dave, Paresh. 2018. "China Exports Its Restrictive Internet Policies to Dozens of Countries: Report." Reuters, November.
- Deloitte Insights. 2018. "China Inside: Chinese Semiconductors Will Pow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cember.
- Denning, Dorothy. 2019. "Is Quantum Computing a Cybersecurity Threat?" American Scientist, April.
- Financial Times. 2019. "How China's Smart-City Tech Focuses on Its Own Citizens." June.
- Financial Times. 2019. "Huawei Founder Predicts Internet of Things Is Next US Battle." July.
- Fortune. 2019. "Inside the Trade War's Tech Battle that Neither China Nor the U.S. Can Afford to Lose." November.
- Gewirtz, Julian. 2019. "Look Out: Some Chinese Thinkers Are Girding for a 'Financial War.'" Politico, December.
- Hsu, Jeremy. 2019. "Don't Panic About Rare Earth Elements." Scientific American, May.
- Naughton, Barry. 2018. *The Chinese Economy: Adaptation and Growth*.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Naughton, John. 2019. "Will Advances in Quantum Computing Affect Internet Security?" The Guardian, September.
- PwC. 2017. "China's Impact o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2017 Update." November.
- Rapoza, Kenneth. 2019. "Next Up in China Trade War: Biotech Purge?" Forbes, September.
- Reed, J.R. 2019. "President Trump Ordered US Firms to Ditch China, but Many Already Have and More Are on the Way." CNBC, September.
- Thomas, Elise. 2019. "Huawei and 5G: What Are the Alternatives?" The Strategist, March.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 VerWey, John. 2019a. "Chinese Semiconductor Industrial Policy: Past and Present."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and Economics, July. SSRN.
- . 2019b. "Chinese Semiconductor Industrial Policy: Prospects for Future Success."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and Economics, August. SSRN.
- Wu, Yixiu. 2019. "Is Coal Power Winning the US-China Trade War?" Chinadialogue.com, December.
- Yap, Chui-Wei. 2019. "State Support Helped Fuel Huawei's Global Ris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Dr. Ashish K. Jha关于应对全球公共卫生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观点

Dr. Ashish K. Jha [1]和杭明理[2]

[1] Ashish K.Jha, 医学博士, 公共卫生学硕士, 内科医生, 卫生政策研究者, 布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第三任院长。在加入布朗之前, 他曾任Harvard T.H. Chan公共卫生学院全球卫生教授, 哈佛全球卫生研究所 (HGHI) 主任。
[2] 杭明理是2021届哈佛学院政治和医学预科研专业的学生。

在线发布

2021年1月

参考资料

Dr. Ashish K. Jha, interview by Franklin Hang, November 20, 2020. IUCJ 1 (Winter), 13-14.

杭明理: 我们先来谈谈美国的疫情情况。特朗普政府在应对疫情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功, 在哪些方面失败了, 今后应该采取哪些不同的防疫措施?

AKJ: 显然, 美国的疫情管控很糟糕。这从最简单的数据上就显而易见: 超过1100万美国人被感染, 25万美国人死亡。与此同时, 这个数据还在激增之中, 接下来的两三个月里可能还将有10万到15万美国人死亡。之所以这么糟糕,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忽视了对公共卫生的科学管理。而且白宫和其他方面也提供了许多错误和不实的信息。这使得有效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变得非常困难, 但疫苗是政府做的还不错的一个方面。现在我们应该讨论一下疫苗, 这并不是说政府以某种方式创造了疫苗, 而是科学家创造了疫苗。但是, 政府所做的一些关键的事情有助于加快这些疫苗的上市进程。当然, 疫苗离广泛应用还有很长的时间, 所以尽管疫苗会有帮助, 但我们不能完全靠疫苗来战胜疫情, 而且现在还有很多其他事情可以做。

那么, 有哪些是我们现在能够努力做到的呢? 我们要呼吁人们戴口罩。在限制室内活动和人群聚集方面, 也会采取一些相关措施。(特朗普) 政府在对疫情检测方面没有采取合理措施, 如果确保对疫情的检测, 结果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

杭明理: 特朗普总统和当选总统拜登之间的权力

交接可以说是十分艰难的。特朗普政府声称选举有舞弊行为, 将权力的正式交接推迟了数周, 并拒绝就包括应对疫情在内的关键问题与拜登团队会面。这种延迟的过渡会产生什么影响?

AKJ: 大选年爆发疫情注定不太平。今年的情况尤其糟糕, 因为我们缺少一个有效的过渡。我们中的许多人一直在延续2008年的模式, 当时布什总统任期结束, 而奥巴马总统正要当选。我们正处在一场金融危机中, 两个团队非常有效地合作, 帮助国家渡过危机。这本应该是美好的, 我想我们都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但这次我持怀疑态度。因为现在的局面意味着拜登政府将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接过指挥棒,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被感染, 到那时每天可能有2000-3000名美国人死亡。拜登政府需要几个星期、几个月才能真正开始运转。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过渡, 疫苗将需要更长的时间来部署。到最后, 豪不夸张得说, 这将意味着可能还会有3万到5万美国人死亡。如果有一个有效的过渡, 结果可能就不是这样了。

杭明理: 在应对疫情方面, 美国能从欧洲和亚洲国家吸取什么经验? 这些对拜登政府的战略有何启示?

AKJ: 事实证明, 如果三个月前我们进行这次谈话, 我会提到一些欧洲国家, 并说他们做得很好

但令我惊讶的是，这些国家中的许多国家对第二波疫情的管理是存在不善的。所以，现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再次陷入了困境。一些欧洲国家做得还算不错，但一些东亚国家以及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在处理疫情方面做相比要更好。

所以，人们经常说，抗疫有什么灵丹妙药？它们是怎么做到的？如果你看看像韩国这样的地方，他们的策略是进行新冠检测和数据追踪，并良好的基础设施作为辅助；日本检测方面的基础设施也不错。这些措施都没什么特别之处，但大家都戴着口罩，而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追踪管理也非常好。新西兰在不仅在这两方面做了措施，而且在封锁和隔离方面也才采取积极回应。德国也许是欧洲主要国家中做的最好的，他把这三种措施混合在一起共同实施。所以，抗疫是没有单一的解决办法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认真对待病毒。如果轻视病毒，它便会惩罚你。如果你认真对待它，其实是多种措施可以采取的，你可以使用其中任何一个办法来控制病毒的发展。

杭明理：现在让我们谈谈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的国际合作与协调，从世界卫生组织（WHO）开始。你认为世卫组织在未来的政策协调，包括疫苗开发和分发方面发挥什么作用？

AKJ：世卫组织实际上是世界卫生协调机构，而且当提及疫苗时，（世卫组织）可以很好地将各国力量团结起来。一种叫做COVAX的计划，它致力于将疫苗推向全世界。世界上几乎每个主要国家都已签署加入COVAX计划，唯一例外的是美国，但我认为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这种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变。

世卫组织不会成为疫苗的生产商或资金提供者，但它将在协调和推动卫生部发挥核心作用。那这就涉及到了问题的核心，世卫组织的使命是什么？而且，更重要的是，世卫组织的任务中不包括什么？有时，世卫组织会因为问题定义太宽泛而陷入麻烦。但在这种情况下，集中精力协调让各国团结起来，并确保疫苗的公平分配至关重要。

杭明理：你提到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控制新冠疫情方面的出色表现。这两个国家已经很好地控制了疫情，他们允许进行双边的跨国旅行。因此，我的问题是：世卫组织的协调与如此紧密的双边卫生政策合作有何利弊？

AKJ：我认为的关键是要明白多边主义和双边主义不一定是矛盾的，双边关系始终存在。例如，美国与加拿大的关系不会由联合国调解，我们将与邻国或其他国家建立双边关系。关键是像世卫

组织这样的机构要了解差距在哪里，哪里需要填补，以及在双边关系不可能或不具有建设性的情况下，它如何能够提供帮助。当你考虑疫苗时，我们不一定需要每个国家都与每一个主要的大规模疫苗生产商都谈判达成协议，这样做是没有必要的。这就是像世卫组织或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这样的组织能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刻。

杭明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美中双边关系。美国的许多团体，包括国家安全专家和美国公司，对中国有深深的不信任。我们如何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信任，特别是在改善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方面？

AKJ：让我们首先考虑如何与公司和国家机构建立信任。这虽然不会很简单但也不能凭空想象。知识产权方面确实存在问题，中国和美国有时在地缘政治上存在利益冲突。但我始终相信，政府不只是代表它们自己，政府所回应的是为了它们所代表和服务的人民。这就是为什么我呼吁加强美国大学和中国大学之间的联系，以及美国公民社会机构和公民社会机构之间的联系。我们非常清楚知识产权存在问题，且必须谨慎处理。中国知识成长和发展正在进入一个全新阶段。产权数量和科学质与20年前大不相同。所以，我认为建立民间社会组织将使得解决这些事情变得更容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很快就能看到两国之间在军事上的合作，但现阶段来看公司会因为知识产权问题而感到威胁，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长期关系问题。总而言之，通过交涉取得的进展要比通过挑衅对方好很多。特朗普政府的挑衅做法，是个错误且失败的策略。

杭明理：正如您所知，两国之间的不信任和紧张关系扼杀了在新冠疫情上的合作。为了防止未来的疫情变得更加严峻，这种关系是否要有所改变？

AKJ：我认为两国政府都是有所遗憾的。现在中国政府有很多问题需要追究责任。在管控疫情期间存在大量的侵犯人权的行为，而且在最初出现疫情时（例如隐藏信息）确实是有不利的方面，所以这个过程并不是完美的。所以我倾向于相信两件事情，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天然的盟友，两国间有悠久的合作历史，政府做什么不代表公民做了什么，我们要有更多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流。美国与中国深入接触，中国应该也与我们深入接触。其次，那就是美国和中国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将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两国）对如何与世界交往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但我认为相互竞争不如相互合作有用。只要两国能朝着一种更为合作的模式发展，世界将因此变得更好。

促进中国的科技发展

石倚川,[1] 施怡聆,[2] 安成龙,[3] Peter Winston Michalak,[4]和陈志欣[5]

[1] 石倚川是2023届麻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和城市规划与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

[2] 施怡聆是2022届上海纽约大学社会科学（城市研究方向）和商学与金融学专业的学生。

[3] 安成龙是2021届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与口译专业的学生。

[4] Peter是2021届哈佛大学电子工程专业的学生。

[5] 陈志欣是2022届指韦尔斯利学院数据科学和经济学（计算机科学方向）专业的学生。

摘要：科技发展是中国经济的核心，而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凸现了科技发展在中国的巨大作用。虽然应对新冠疫情加速了很多相应的科技发展，但也暴露出并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在科技发展方面表现出的两极化现象：当大公司通过与政府合作而获得更大市场份额时，中小企业却因本已有限的投资和创收渠道被切断而受到影响。鉴于这一趋势以及中美贸易战范围的进一步扩大，我们提出了一个三阶段的解决方案——通过技术中介机构和加强反垄断措施来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进一步从法律上保护知识产权，以及用欧洲标准来补充现有的隐私准则——力求在促进大型企业的繁荣发展以及保护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创新可持续力之间取得平衡。此外，我们希望这些建议还将进一步推动开展全球合作和贸易，特别是在当前因新冠疫情而导致国际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的大背景下。

关键词：科技发展；中小企业；知识产权；隐私保护；技术民族主义；中美贸易战

在线发布

2021年1月

参考资料

Shi, Yichuan, Yiling Shi, Chenglong An, Peter Winston Michalak, and Carmen Chan.. 2021. "Promoti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 China [促进中国的科技发展]." IUCJ 1 (Winter), 15-18.

背景

在许多发达国家，数字技术的发展已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并跃升为全球热点话题。这其中的例子包括美国的“国家机器人计划2.0”、德国的“数字战略2025”、日本的“新产业结构构想”等。这些案例都旨在通过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技术推动经济发展。在这样的全球背景下，我国也在2015年发布了以《中国制造2025规划》，以“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数字技术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积极调整政府职能，完善相关配套政策，营造良好环境”为原则。¹在发布一系列战略转型以来，中国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根据政府产业创新发展平台专项智库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显示，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为35.8万亿元人民币（5.18万亿美元），占GDP比重为36.2%。²

然而，正如大多数发展计划遇到的情况一样，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具有难以置信的破坏性，也扮演着变革加速器的角色。因为数字技术可以在没有人际接触的情况下开展行动，新冠肺炎疫情推动了数字技术在深度参与抗击疫情、稳定社会，并开始修复全球经济的进程。政府与数字公司之间在医疗用品、地图、媒体等各个领域开展

了许多合作，提供了很多新兴的数字抗疫解决方案。虽然这些举措大多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同时也暴露出技术发展格局中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例如，中国政府倾向于与成熟的行业巨头合作，而不是与中小企业合作^{3,4}；对于企业来说，利润往往会因为与政府的合作而不能达到市场自主调控时的高度；政府与数字企业在用户隐私方面存在信任问题等^{5,6}；而数字企业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考虑，对政府的过多干预持谨慎态度。⁷为了保证未来五年技术的顺利发展，解决这些问题是刻不容缓的重中之重。

因此，结合因疫情导致技术规模和作用迅速转变的背景，以及中国与西方贸易伙伴间因政治问题而日益紧张的关系，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进行更广泛的战略评估。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需要同时促进大规模的“国家胜利”，例如华为需要通过明确其动机来消除外国合作伙伴的疑虑并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成功，同时也要确保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的持续发展，尤其是考虑到疫情迫使小企业的生存变得更加艰难而大企业却获得了发展机会的两极化影响。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自21世纪初以来，中国的科技创新成果发

展迅速，但科研成果的商业化转化效率却不高，只有10%-15%左右，⁸远低于其他主流发达国家的转化水平。虽然2015年出台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但相较于其他创新激励措施，它未能有效激励技术的创造者和技术转化的中介者。直到2019年，国务院才开始强调中介机构的作用，2020年，已有专家建议采取市场化的方式促进商业化。在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贸易紧张的背景下，中国迫切需要通过激励成功的商业化来促进中小科技企业的成长。

技术中介机构

印度尼西亚在技术中介上很有代表性，因此我们可以考虑参考印度尼西亚的国家方法。⁹印度尼西亚的方针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政府的作用和中小企业创新中的三个实体（研发机构、中小企业技术和技术中介机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忽略了中小企业创新中这三个实体的各自发展与相互联系。在中国，虽然研发机构和中小企业技术这几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技术中介机构的发展却乏善可陈。

技术中介机构是研发部门和企业之间的桥梁，可以做到增强外部创新的“吸收能力”的作用。技术中介不仅能促进新兴技术公司的发展或从传统低技术部门向高技术新兴产业的转型，而且还能使它们雇用相当数量的人员以形成产业。

充分发挥科技中介机构对中小企业的促进作用有三个潜在的途径。第一，优惠的税收政策，帮助中介机构在萌芽阶段自立门户。第二，组建提供专业服务的行业人才队伍。第三，努力营造有利于创业者获取和使用创新技术的生态环境，为整个技术创造者、传播者和中介机构体系注入活力也是必不可少的。

调整《反垄断法》

在中国的技术发展格局中，企业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是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反竞争环境。对于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来说，技术发展形势尤其具有挑战性——它们无法像大公司那样利用政府支持、经济救济战略、金融支持结构或市场地位。华为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它的成功得益于中国政府的支持以及反垄断政策的相对缺失。因为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有军方背景，因此军方成为该公司早期最重要的支持者和客户之一。如今，华为已被称为中国的“国家胜利”之一，并在国家成为全球网络安全领导者的计划中处于核心地位。¹⁰该公司本身就能够利用中国现有的数字政策来发展更大的规模和影响力，而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其获得了更大程度的政府支持。¹¹如果想要通过增加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的

竞争和机会，并为中国的创新打开大门，就必须有更加完善的政策来支持中小型公司，如更完善的反垄断政策。

目前有效的防止垄断形成的法律是2008年通过的中国《反垄断法》。尽管《反垄断法》相对较新且应用该法的案例还并不多（其中一个案例中华为实际受益者），¹²但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吴汉宏教授所指出的，该法有几个重要的缺陷。事实上，中国的普通民众认为反垄断法应该彻底实施，而政府则认为该法应该根据需求逐步推出。普通民众和政府之间的分歧反映了中国在起草反垄断立法和部署反垄断政策方面缺乏经验。中国在这方面缺乏经验和在反垄断法领域的专业人员不够充足都是中国反垄断执法力度有限的原因。此外，反垄断执法机构与技术开发公司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很少，这使得相关利益方更难明确如何理解和应用该法律。¹³

欧盟及其竞争法可以作为一个可参考的框架。欧盟的竞争法通过规范公司的反竞争行为，确保它们不形成垄断，从而促进和保护欧洲市场的竞争。欧洲法律所描述的行为与《反垄断法》所描述的行为类似，但欧洲在打击反竞争行为和滥用支配地位方面也有明确的程序规定。竞争法由欧盟委员会监管，这些程序可以对欧盟委员会、任何一个联盟成员国的竞争主管部门或另一个国家竞争主管部门都适用。《欧洲联盟运作条约》第101和102条明确规定了评估、分析、调查和裁决欧盟滥用支配地位和反竞争做法案件的程序。^{14,15}类似于欧盟竞争法的政策将使得中国的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受益。建立一个专门负责解决与反竞争行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或其他垄断行为有关的案件的机构，将使中国的新公司获得与大型成熟公司同样的发展机会。这样一个机构的建立将简化反垄断法的执行难度，并将使得公司和政府机构在其行为和决策中解释和纳入其立法的方式更加清晰。总的来说，包含以上几点的政策将促进中国技术开发公司的创新和合作。

知识产权保护

加强和调整现行的知识产权法规对中国企业在国际舞台上以及在国内发展的持续成功都至关重要。国内有关知识产权的现行准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的市场化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后向他国学习的经验所决定的，然而这种经验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将西方的法律定义移植到国内现状的困难。从条文上看，中国保持着全面的知识产权保护结构，然而这种标准的执行往往难以得到保证。¹⁶虽然严格遵守WTO的知识产权标准可能会促进一些行业的创新，但也可能会扼杀国内其他行业的发展。因此，从技术发展的国家利益角度出发，促进更严格和更有成效的知识产权保护的第一步是增加法院在知识产权纠

纷中的相对权力，从而从根本上提升创造权。

建立正式的发现程序

在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民事诉讼中，可以采用审前发现程序来收集证据，为实际案件做准备。证据开示的法律程序为双方当事人提供了众多渠道，通过询问、取证、请求承认等方式从对方获取相关信息，这对于案件的胜诉往往至关重要。¹⁷然而，中国缺乏正式的证据开示程序，就像1938年以前的美国一样。在具体涉及知识产权侵权的案件中，缺乏正式的证据开示程序往往意味着知识产权侵权者没有任何法律义务来提供关键的证据来证明他们的侵权行为——换句话说，提供证据的举证责任在于原告。¹⁸因此，建立一个正式的发现程序——特别是赋予律师获取间接信息的权利，以达到立案的目的——对于给知识产权侵权的受害者提供维护自身权利而言至关重要。

重新定义证明的要求

目前，中国律师在成功证明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况下，只能在知识产权诉讼中获胜，即只有当被告的行为被证明是过失或故意时，才会被认定有罪。¹⁹然而更广泛接受的知识产权诉讼标准是作为严格责任侵权行为的主体，即责任的承担不取决于过失或损害的意图，而只取决于所造成的损害。²⁰在知识产权侵权的具体应用中，基于严格责任的定义更贴近大多数知识产权盗窃的实际情况，而改变这种法律上的举证责任，将给予知识产权盗窃的受害者——尤其是规模较小的国内企业和创造者——更大的保护，使其免受侵害。²¹

隐私保护

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对国内侵犯隐私的现状进行了调查，他们的调查结果让人“触目惊心”——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侵犯隐私的现象非常普遍。这不仅预示着建立具体、系统的解决方案的紧迫性，以及增强消费者隐私意识和自我保护思想的迫切需求。²²此后，为提振人们对隐私保护的信心，政府出台并实施了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决策，包括2016年全国人大通过了里程碑式的立法《网络安全法》。然而，鉴于疫情带来的挑战和全球对中国企业更好地保护隐私的期望，未来技术发展的成功需要更严格、更全面的准则，尤其是应用于数字技术的准则

来自GDPR的启发

2018年，欧盟通过了一项名为《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关于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

的里程碑式立法，为全球消费者隐私保护制定了最严格的标准。虽然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模仿实施GDPR，但中国的立法者可以参考欧洲立法的详细定义，以厘清中国已有的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法中的模糊术语。

2016年出台的《网络安全法》确立了基本的隐私要求，禁止网络运营商收集非必要的数据和未经同意共享的可识别数据。²³然而，仍有待界定的是，公司所需采取的确切步骤，以遵守匿名化、给予同意和保护个人信息的关键要求。尽管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给出了一套较为详细的建议，但目前仍没有可执行、可操作的法律来维护这些关键步骤。²⁴换句话说，目前中国的网络隐私保护标准不像法律，而更像建议。

因此，鉴于这种现状，我们强烈建议《网络安全法》的修订应参考GDPR中部分条例，即允许数据控制者处理个人数据的六大保护原则：法律义务、目的限制、数据最小化、准确性、存储限制和保密性。²⁵此外，《网络安全法》所概述的“必要信息”的一般定义也可以通过借鉴GDPR中相关内容进一步精确。²⁶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受严格的欧洲模式启发的隐私保护改革不仅对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后制定新的行业标准有重要帮助，并对未来与欧盟的经济和技术合作也将带来潜在益处，尤其是在中国整体贸易环境与美国的关联性和适用性都逐渐减弱的情况下。革新隐私保护措施，不仅可以在政府与企业合作中寻找解决目前问题的办法时，促进国内对数字企业的信任，也将为中国科技企业在国际市场的推广带来更多机会。²⁷

讨论：技术民族主义与技术扩张

自2020年4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并成立“外国参与美国电信服务业评估委员会”以来，中国对美国电信的投资基本受到限制。从华为到滴滴打车，中美两国的电信巨头和各自政府都表达了前所未有的坚定态度，以捍卫自己的立场。尽管双方过去存在根深蒂固的分歧，但在网络安全、知识产权、海外投资等问题上都表示愿意做出让步。这些妥协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互惠互利：美国为追求自己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从而使得中国可以继续大力发展技术，促进经济发展。

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的是美国科技民族主义的崛起和中国进一步继续科技扩张的野心。随着中国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技术架构，并在关键的先导性科技产业中聚集更多的人才，中国正在挑战以美国科技霸权为基础的中美科技关系现状。因此，美国逐渐发现，自己不仅在一些以前不被认为是敏感的技术领域处于弱势，而且其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也受到了日益先进和广泛使用的中国技术的挑战。

相比之下,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尽管行业内竞争不公平,但整个行业上下游一体化形成的“开发—出口—开发”综合体正在成长为整个科技产业的优势圈并不断积累正向反馈形成良性循环。更多的扩张为大家提供了更多的成长空间的同时也存在有两个问题:一方面,新的增长空间在企业之间很不平衡,巨头和国企占据了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对科技巨头的负面影响给整个中国科技产业带来了限制和阻碍,这一点在今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在海外和国内的双重压力下,中小型企业很难发展壮大,产业结构的不健康也导致科技扩张的不持续。

由此,我们总结出了实现中美相互依存的新模式:这既能减轻美国人对中国技术威胁的担忧,同时又能优化中国技术产业结构,实现可持续技术扩张的解决方案。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案,通过科技中介机构推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强化反垄断措施,进一步从法律上保护知识产权,用欧洲标准补充现行的隐私准则。这将使中国的科技产业走向更加成熟的监督管理体系,并能被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接受。这些不仅能打消美国的顾虑,同时也是鼓励中美在科技领域建立新型关系,以及中国拓展更大国际市场的必经之路。我们充分认识到在科技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今天,中美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是非常必要的:美国和中国不应该把对方看作为对手,相反,而应该是在国际社会中通过良性竞争和合作共同成长的伙伴。此外,中国应该在调以及建立互利关系上迈出第一步。

参考文献

- [1] Al-Sayed, R.和Yang, J. (2018),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中国智能制造生态系统》,《科技政策管理杂志》,第11卷第3期,第291-310页。https://doi.org/10.1108/JST-PM-02-2018-0012。
- [2]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 (2020, July 03). http://m.caict.ac.cn/yjcg/202007/t20200702_285535.html
- [3] 5G, 装备起来。(2020年5月13日)。 <https://carrier.huawei.com/en/spotlight/5g>。
- [4] 阿里巴巴数字经济科维德-19支持力度。(2020年07月07日)。 <https://www.alizila.com/alibaba-coronavirus-efforts/>。
- [5] 在进军美国的过程中,中国的科技巨头们在数据隐私方面举步维艰。(2018, July 03). www.scmp.com/tech/china-tech/article/2126823/chinese-tech-giants-struggle-data-privacy-they-seek-make-headway。
- [6] 印度, P. (2019年12月20日)。中国点名羞辱科技巨头侵犯应用隐私。 yourstory.com/2019/12/china-reprimands-tech-giants-app-privacy-tencent-xiaomi。
- [7] 华为警告知识产权的“政治化”。(2019年6月27日)。 <https://www.scmp.com/tech/big-tech/article/3016261/huawei-warns-against-politicisation-intellectual-property-and-says-it>。
- [8] 王洋. (n.d.). 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3/15/content_5373810.htm
- [9] Simamora, M., Aiman, S., & Jamali, A. (2016, February 21).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Based SMEs, Transfer of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Strengthening in Indonesia.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735442。
- [10] Melnik, J. (2019). China's "National Champions" Alibaba, Tencent, and Huawei. *Education About Asia*, pp.28-33.
- [11] Keith Johnson, E. (2019, April 03). The Improbable Rise of Huawei.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4/03/the-improbable-rise-of-huawei-5g-global-network-china/>
- [12] 王旭 (2016)。第十二届亚洲竞争论坛年会。SEPs与中国的竞争法问题--从华为诉IDC看。
- [13] Wang, H. (n.d.). 中国反垄断政策: 成就、问题与展望[PDF].
- [14] 滥用支配地位的反托拉斯程序(《欧盟条约》第102条案例)。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procedures_102_en.html。
- [15] 反竞争协议中的程序(《欧盟运作条约》第101条案例)。 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procedures_101_en.html。
- [16] Xiu, J. (2017, November 17). 关于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有关的几个问题。 <http://www.xujiali.com/CQXG/1065659.jhtml>
- [17] <https://www.law.cornell.edu/wex/discovery>。
- [18] 外交官, W. China's Progress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ediplomat.com/2018/01/chinas-progress-on-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yes-really/。
- [19] Xiu, J. (2017, November 17). 关于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有关的几个问题。 <http://www.xujiali.com/CQXG/1065659.jhtml>
- [20] 严格责任。(n.d.).2020年10月12日,从 https://www.law.cornell.edu/wex/strict_liability。
- [21] 冯晓青. (n.d.). 关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几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http://chinawto.mofcom.gov.cn/article/br/bs/201811/20181102808886.shtml>
- [22] 关于股东和公司。 https://blog.csdn.net/weixin_34235135/article/details/85629713。
- [23] 盛伟 (2020年3月16日)。GDPR一年后,中国加强个人数据监管,迎来专法--TechNode. <https://technode.com/2019/06/19/china-data-protections-law/>。
- [24] China's Emerging Data Privacy System and GDPR. (n.d.).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hinas-emerging-data-privacy-system-and-gdpr>
- [25] GDPR的6项隐私原则。(n.d.). <https://www.privacypolicies.com/blog/gdpr-privacy-principles/>。
- [26] Bigg, C., Cheung, V., & Song, F. (2020, June 10). 中国: 更多中国隐私保护和网络法的重要发展: 见解与洞察。DLA Piper Global Law Firm. <https://www.dlapiper.com/zh-Hans/hongkong/insights/publications/2020/06/navigating-china-episode-13/>。
- [27] 中国发布数据安全法草案。 www.hunton-privacypolicy.com/2020/07/07/china-is-sues-draft-data-security-law/。

增强环保意识：黄忠和史凯利因斯基谈论中美在气候变化上的合作

黄忠,[1] 史凯利,[2]和李燕妮[3]

[1] 黄忠是亚洲可持续性金融研究所的联合创始人和执行董事、美国最大飞行模拟器和虚拟现实体验平台MaxFlight公司的董事及高级副总裁、先后联合创立了中国上海览汇展示设计有限公司、湾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中国南京禹为知识产权事务所等企业，兼任美国佛罗里达州大奥兰多地区经济发展委员会特别顾问，同时在西方中国史领域重要的学术杂志《近代中国》任职。

[2] 史凯利是全球知名的可持续性金融教育家、作家和实践咨询专家，是全球性教育、咨询与基金管理顾问机构可持续性金融学院的创始人之一。

[3] 燕妮于2020年从卫斯理学院毕业，本科主修艺术史和东亚研究。



在线发布
2021年1月

参考资料
Huang Zhong and Cary Krosinsky, interview by Yanni Li, December 3, 2020. IUCJ 1 (Winter), 19-21.

YL (李燕妮)：在您看来，过去几年内中国和美国在可再生能源投资方面有哪些成功和失败？在这个领域里，两国现在的合作状况如何？

黄忠 (HZ)：中国在太阳能光伏 (PV) 发电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到2019年底总装机容量已超过200GW。自2015年超过德国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太阳能发电第一大国。除了光伏以外，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光热能市场。

中国目前的风力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236GW，是排名第二的美国（风力发电装机容量为105GW）的两倍多。中国的水力发电量已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此外它还有望在2022年超越法国成为世界第二大核能发电国，并在四年后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目前中国也在全力以赴，力争到2024年基本建成全国性的氢能源基础设施。

在2015年签署《巴黎协定》之后，美国本可以借此机会领导世界并与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展开深层次的合作。但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立即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在其任期内，特朗普不仅放弃了在全球气候行动中的领导地位，而且在创新

和投资方面也落后于中国。

过去几年中美之间在诸多领域鲜有合作。除了特斯拉 (Model 3是目前中国最畅销的电动汽车) 和通用电气可再生能源部门 (GE Renewable Energy) 等私营跨国企业，中美之间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几乎无任何亮点 (GE在中国快速增长的陆上和海上风力发电项目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

CK (凯利)：美国国内实际上在再生能源领域还是有一些动作的，只不过都集中在私营部门或州一级政府。我预计在拜登的领导下，这种情况将会改变，比如提升燃油效率，恢复奥巴马政府的《清洁能源计划》以及其他加快美国气候和能源转型的政策。但是由于国会在这方面的分歧很大，且这种状况还可能还会持续下去，因此他的很多计划只能通过发布行政命令来解决，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美国一直缺少机会就气候行动的重要性对公众进行系统教育，如果各方能就气候问题达成广泛共识，那就能转化为有效的行动。事实上，正是由于缺乏共识才导致虚假信息的泛滥。所以我们认

为最需要改变的是就气候问题的广泛宣传和教育。

YL (李燕妮) : 近年来,中美双边能源行业的交流受阻,中国的核电产业在国内外的的发展都受掣肘,在能源装备的竞争性技术领域,美国政府也转向了不支持合作的立场。您觉得中国在能源领域如何管控国际政治风险,有效应对美国制裁?

黄忠 (HZ) : 无论美国怎么做,中国都将全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这不仅是因为人民渴望清洁的空气和水,而且还涉及到它自身的能源安全问题。另外,中国本身也从发展清洁能源产业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就核能来说,中国第一座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反应堆(华龙一号)目前在福建省正式并网发电。这标志着中国打破了西方对核电技术的垄断。该消息发布之际,也正值中国宣布到2030年之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并逐步减少对燃煤发电的依赖。这些新型三代核反应堆的部署应有助于习近平主席实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中国与西方国家处于基本相当的水平,但相比之下,中国具有政策长期稳定、连贯,市场容量大,创新和执行速度快的优势。

美国将很难在不伤害自身(和世界)利益的情况下通过制裁达到限制中国发展的目的。

CK (凯利) : 中美之间缺乏合作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我们希望新一届政府上台后,情况会有所好转,因为这可以帮助打开创新之门,使各方获利。比尔·盖茨等业界领袖主张在核能和其他低碳技术等方面进行广泛的国际合作。

数十年来,美国在中东的安全困境证明了维持基于化石的能源安全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中国不想在控制全球的油气资源方面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但是它仍然希望为其人民提供更好的经济福利和清洁的水与空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应用大部分可以实现本地化,因此受禁运或贸易争端的影响较小。转向清洁、可再生的能源是最合乎逻辑的保障能源安全的政治决策。

YL (李燕妮) : 在气候变化以及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创新能为中国和美国带来什么样的经济益处?中国和美国在国际上有着怎样的领导力,中美如何能够合力改善气候变化并共同领导全球创造一个更加绿色的世界?

黄忠 (HZ) : 中国迅速启动可再生能源行业,

主要是为了满足其经济增长对能源的持续需要(如三峡大坝发电项目)。同时它也发现了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的积极影响,因此快速成为该领域的主导者。中国的太阳能光伏产业规模位居世界第一。政府补贴不仅降低了中国应用太阳能的成本,也降低了世界其他地区应用太阳能光伏的成本。此外,五年前中国还很少提及绿色金融或可持续金融。今年中国已经为大小银行设定了强制性的绿色金融目标。这种积极的国内政策转变最终将“溢出”到其他国家。我相信中国有能力将全球气候危机转化为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机遇,但更重要的是,通过驱动这个领域的发展,中国将有机会成为真正的全球领导者并帮助制定全球议程。

我还相信,合作是解决诸如气候变化和可持续转型等全球性关键问题的唯一可行之路。美国和中国是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但它们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渊源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他国家在气候议程上的决定。

理性地看,中国和西方应该在气候变化方面广泛合作:首先,气候变化是每个国家,尤其是两个最大经济体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其次,与其他“国家安全”问题相比,气候变化和可持续性的敏感性较低。实际上,气候变化是超越任何“国家安全”的“星球安全”问题。第三,全球投资者正在分配更多的资金到气候变化领域。第四,消费者和年轻一代越来越具有“气候意识”,企业也开始将气候和可持续性问题纳入商业发展规划。聪明的公司会将气候变化视为一个巨大的商机。

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很难想象中国为什么不想成为全球气候行动的领导者。实际上,它一直在尝试通过“绿化一带一路”等倡议来向全球输出其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议程。它的经济规模也可以通过出口低成本的“绿色产品”使其他国家受益。尽管习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做出的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承诺使许多人感到惊讶,但我相信,这反映出—个事实:即中国了解领导全球气候行动的重要性以及相应的机遇。

CK (凯利) : 在过去一段时间,美国的低碳能源转型极大地受益于中国优质廉价的太阳能电池板。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降低了太阳应用的成本,使美国的低碳能源转型更具成本效益(我自己去年就在居住的康涅狄克州安装了太阳能电池板。这里的太阳能发电成本将比电网更低)。

这是美国和中国如何共同努力以帮助彼此实现低碳能源转型的一个例子。希望可以在拜登领导下继续加速此类合作。由前国务卿克里等曾致力于

推动中国加入《巴黎协定》的领袖的来负责气候变化和相关的外交合作，会有助于促成双赢局面。

奥巴马政府错失了参与亚投行的机会。谁不能参与某个国际组织，但仍然可以对它施加影响？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希望拜登不会重蹈覆辙，而是转向寻求直接参与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挑战，这将有可能促进两国关系向好发展。

YL (李燕妮)：在拜登上台后，中美之间的关系有望进入“竞争并合作”的模式。这种情况下，气候变化、环境与可再生能源领域将会更多成为一个竞争的焦点还是开展合作的领域？气候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成为美国重塑全球领导力的重心？这会如何影响到其关于中国的政策？

黄忠 (HZ)：如今，中美两国在贸易、新冠疫情、华为、南海等问题上几乎没有多少共识。甚至连气候变化都不成为了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几乎完全从美国国务院的外交政策议程中消失了，这就排除了两国之间就此合作的可能。

但是，美国和中国不仅是两个最大的经济体，而且还是最大的温室气体 (GHG) 排放国。中美在气候行动上建立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实际上，中美合作是解决世界面临的气候危机的唯一途径。Cary和我为此还撰写了《现代中国：通过国际金融合作解决可持续性挑战》一书，希望能有所启示。

就拜登政府而言，他准备将气候行动扩大到环保部门之外，使之纳入从农业部到财政部的整个联邦政府体系中。这是正面气候变化已经影响到了美国人生活诸多方面的正确态度。

另一方面，中国则已经将气候变化作为可以与欧盟紧密合作的关键领域之一。习近平主席宣布2060年实现碳中和愿景后，欧盟外长约瑟普·博雷尔表示：“如果言行一致，中国要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宣言将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里程碑式的转折点。”

不管美国在两党制下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如何反复，中欧都已经同意在这一领域广泛合作。美国要想保持其全球领导地位，就需要认真思考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长期立场。

CK (凯利)：自我们可持续金融学院于2019年1月在深圳举办的《中国可持续投资的未来》国际论坛以来，中国与许多国家一样在可持续投资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非常希望这种积极变化能持续下去。拜登是一个愿意促成共识的人，而

且他也有压力去做对经济、气候变化和投资有利的事情。近年来华尔街投资不断涌入中国，这也为可持续投资创造了机会，我非常希望美中两国在这个领域进行更广泛的合作。即使是在有争议的领域，我们也需要尽可能地合作，通过建立良好、互信、和相互尊重的关系，双方才有可能最终达成解决问题的共识。我们认为即使在技术、人权和南海等争端领域，双方都有建立安全空间 (safe spaces) 的可能。

我不确定当前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尊重以及由此产生的错误信息对美国民众的影响有多深。但文化总是自上往下渗透的。克里的任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019年春季在我的一堂课上，他曾对中美关系断崖式下跌表示愤怒。希望拜登至少在气候变化方面恢复与中国的合作，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我相信这也是克里国务卿的期望。

双方都有充分的理由去努力实现气候合作。希望美中两国结成伙伴，以帮助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低碳转型。这种积极的转型必将创造许多新的就业机会，如果您是一名学生，也应该认真思考自己可能扮演的角色。

关系中美全球事务：

本部分的文章主要关注与中美相关的全球问题和外交事务。

贝加尔恐中症：对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威胁？

Alexander Naumov[1]

[1] Alexander Naumov是2020届乔治·梅森大学俄罗斯和欧亚研究以及国际政治学的学生。他的研究兴趣俄罗斯国家安全，侨民问题，历史政治以及欧亚大陆的强国竞争。

摘要：本文通过比较并对比的方式分析了中俄间战略趋同与自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民众对中国的看法。聚焦2018年和2019年贝加尔湖附近发生的两起当地抗议中资企业事件。虽然很多俄罗斯人将中国政府视为政治盟友，但舆论数据和抗议活动表明，自下而上的对中国的看法可能会影响到未来中国的发展及其在俄罗斯的投资。显然，战略利益的趋同、共同的半威权主义政治价值观以及2001年以来双边关系取得的成就没能引起俄罗斯社会对中国态度的改善，特别对中国人和其企业。

关键词：恐中症；乌克兰危机；中俄关系；贝加尔湖

在线发布
2021年1月

参考资料
Naumov, Alexander. 2021. "Baikal Sinophobia: A Threat to the Russo-Chinese Strategic Partnership? [贝加尔恐中症：对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威胁?]" IUCJ 1 (Winter), 22-26.

介绍

2018年5月，在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一张抗议海报上写着：“对中国人有利的事，对贝加尔湖不利”。¹这场约60人的示威活动由湖边Listvyanka居民的“抗议”运动为缘起，示威者们呼吁限制其他国家在贝加尔湖周围的开发。这场争议最初始于2018年初，当时一家中资私人建筑工地威胁要阻挡一家俄资酒店的湖景。²一年后，中国在贝加尔湖周边发生了更大的丑闻，引发了包括总理梅德韦杰夫在内的100多万人呼吁并最终导致该地区一家中国瓶装厂的停产。³

中俄公共关系的两次危机象征着俄罗斯对中国的舆论正更广泛的恶化。这种趋势与莫斯科和北京两国顶层精英的在公众面前相互拥抱的亲切关系形成鲜明对比。早在2017年，普京总曾授予习近平主席俄罗斯的最高荣誉——圣安德鲁勋章。⁴中国领导人回赠了专为普京定制的友谊勋章。习近平在普京访京时还称其为“老朋友”和“好朋友”。⁵

普金在2018年6月的出访时曾称赞双方共同建立的“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本文将通过分析西伯利亚南部和远东地区的恐中抗议来解读其对这一关系造成着怎样的威胁。本文将首先讨论西伯利亚动力管道，因为它是双边高层关系中最有受关注且资本最密集的象征。接下来，两

起与贝加尔湖有关的丑闻将与当地原本反对派的声音相呼应，这些反对派已经破坏了中国在中亚的项目，这也证明了中国在俄罗斯东部的投资是必要的。

来自莫斯科的观点：战略融合

2010年代初，俄罗斯与中国加速进入到战略伙伴关系。在2015年5月连任后不久，普京就启动了“太平洋俄罗斯”支点计划。⁶继2001年《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和2008年解决最后一次中俄边界争端之后，这一合作化解了冷战时期的矛盾。⁷考尔德认为，2013-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是两大国走向合作的最关键因素，因为西方对俄罗斯能源、国防和主权债务部门的制裁成倍增加，从而迫使其向西发展[6, p.215]。总的来说，尽管俄罗斯人的统治精英们认识到自己相对的弱势地位，但他们仍然接受了与中国的伙伴关系。这是因为他们优先考虑的是维持国内现状和政权稳定，而这一期望无法与西方国家的期望相兼容。⁸

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多地将与中国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利益趋同看作是国家安全，比如贸易方面，通过发展欧亚陆路从而摆脱受到美国海军的支配；能源方面，俄罗斯作为世界第五大天然气生产国的比较优势，正好呼应了中国作为第一大能源消费国的需求[6, p.433]。此外，俄罗斯认为

外国投资对远东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虽然该地区相比于外国投资更加担心本国的补贴。⁹

2014年批准的价值700亿的西伯利亚电力项目可以佐证这种伙伴关系。¹⁰ 在2019年2月，该管道项目在启动时举行了一个双边的、公开的全国电视直播的仪式。普京在莫斯科以“你好”开场，并命令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首席执行官现场打开阀门，然后习近平下达了北京接收天然气的命令。¹¹ 这条远东地区最大的管道，预计每年向中国输送380亿立方米天然气，对俄罗斯的国家预算至关重要，2018年超过46%的预算由天然气利润构成[10]。

目前的管道并不靠近已成为反华抗议中心的贝加尔湖，但它将在2022年底左右接近珍爱湖。因此，2018-2019年尖锐的恐华反应可能是未来的预演。

双边公共外交 从贝加尔湖畔看问题

双边关系的向好发展似乎与俄罗斯公众将中国视为盟友有关。2020年8月，列瓦达中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在俄罗斯人最亲密的朋友和盟友名单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白俄罗斯），达到40%。这比前一年下降了2%。¹²

随着“西伯利亚动力”管道的建设，中俄两国开展了改善彼此形象的公共外交活动。2015年，中俄媒体领导人在圣彼得堡会面，并签署了旨在“减少西方媒体误读”的合作协议。¹³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刘奇葆呼吁两国媒体帮助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融合，继续支持“本着互信的精神进行合作”。

此外，会议还将2016-2017年定为中俄媒体交流年。该项目在顿河畔罗斯托夫、莫斯科和广州的论坛上连接了数百名中俄商界领袖、专家学者，李克强总理和梅德韦杰夫总理也出席了北京的闭幕式。¹⁴ 李克强称赞此次活动并表示了对两国“高度互信”的支持，梅德韦杰夫则强调在这一框架下举办的250多场活动。

然而，两国政府对“互信”的庆祝似乎更多反映了最高层的关系，而不是俄罗斯对中国的底层看法。竞选期间的全国性代表民调显示，反华观点增长的同时，对一般移民的鄙视也在增加。根据列瓦达中心的数据，2015年至2017年期间，支持限制中国人在俄罗斯永久居留的俄罗斯人比例从15%上升到31%，增加了一倍多。2019年8月，在贝加尔瓶装厂丑闻发生后，这一反应增加到39%[12]。这项民调与媒体交流年的关联，给中国公共外交和俄罗斯国家媒体宣称的合作提出了严重的危险信号。这也与前文中将中国视为俄罗斯第二号盟友的看法相矛盾。2020年8月，莱瓦达中心52%的受访者呼吁拒绝中国公民入境俄罗斯或只允许其短暂入境[12]。

伊尔库茨克作为近两年反华抗议活动的中

心，导致俄罗斯人对中国的负面情绪有以下几条原因。利斯维扬卡抗议者对中国企业和居民不纳税并对把“所有的钱”都送回中国的行为表示不满。¹⁵ 考虑到这些企业的强制注册（2018年最有争议的是酒店），即使中国注册的企业经常以俄罗斯或巴哈马的名义出现，但要想如此大规模地避税是非常困难的[9]。针对中国黑市的非法伐木是另一个不满的来源。¹⁶ ‘抵抗运动’的成员反对他们所认为的中国全面扩张中缺乏纯粹的经济理由。在对帮助发起2018年抗议活动的Listvyanka酒店老板Yuri Sharapov的采访中，当被问及接待中国游客的利润价值时，沙拉波夫回答说：“我将收到丰厚回报。全年20名中国游客。我估计，这大约是1400万[卢布，约合20万美元]。尽管利润丰厚，但我不需要这样的钱。”¹⁷ 与经济竞争相对的恐汉症，这至少是这种敌意的部分原因。

明年贝加尔湖问题的爆发点更为重要，因为它包含了联邦的参与。Instagram和Change.org上的一场社交媒体活动动员了舆论，反对位于库尔图克的AkvaSib装瓶厂，该厂99%的股份都在大庆[15]。这座建了一半的工厂被当地法院下令关闭，其租约也被撤销。在俄罗斯十分罕见的情况也发生了，国家控制的媒体（NTV）煽起了公众抗议的火焰，总理梅德韦杰夫发誓要调查Akva-Sib的环保合规性。AkvaSib远不是第一家环保标准有问题的贝加尔工厂。尽管其污染效果与附近的俄罗斯工厂没有明显区别，但有一年前Listvyanka抗议活动导致环境管制的加强，它在2019年的春季被注意到。

中国在远东地区的参与大多是在农业、木材、建筑、资源开采、服务和海产食品等领域，与大众的看法不同，中国的参与大多是中小型企业。北亚地区确实存在人口和经济的不平衡——俄罗斯远东地区有630万人口，而邻近的黑龙江市有3930万人口[9]——这给俄罗斯的战略思维带来了国家安全层面的问题。¹⁸ 然而，加布耶夫和雷普尼科娃认为，没有任何经济或人口学证据表明当前或未来的中国移民扩张：中国人口最多的地方是莫斯科，而不是任何东部城市，黑龙江的平均工资比邻近的滨海地区高出100多美元。他们2017年对静态的中国移民的分析，如果不下降，今天将因新冠肺炎疫情旅行限制和伴随着正在进行的大流行的恐中症叙述而变得更加复杂。

总的来说，在普京和习近平的战略关系不断加强、互有好感的情况下，全国范围内对中国在俄罗斯存在的正面认知度下降，显示出的是俄罗斯当地居民、当地领导人和国家战略精英之间的不和谐。

对中国在俄罗斯利益的影响

从2018年和2019年涉及当地的政治气候的

伊尔库茨克抗议活动中可以得出两个教训。利斯基扬卡建筑丑闻发生后不久，当地调查发现，在当时的市长领导下颁发的所有建筑许可证都是非法的[16]。在保障装瓶厂的安全时，也存在类似的法律模糊性。这些危机表明，俄罗斯高层发出的支持中国存在的信息并不一定能转化为当地的法律保障。到目前为止，对于像“西伯利亚之力”这样的大型协调的国家项目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但恐中症显然会对中国的中小型企业造成威胁，而最近的双边公共外交运动还不足以遏制这种情况。

第一个含义是，中国公共外交必须转变其关于中国在俄罗斯存在的信息。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与中国民营企业的公关丑闻，比如伊尔库茨克的丑闻，会损害北京外交政策的整体声誉，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BRI）。BRI更多的是一个品牌，而不是一个单一的政策项目，这个标签包含了习近平时代的新基建、被追溯到“BRI”的习前项目，甚至是名副其实的“BRI”而没有中国直接参与的外国企业，比如哈萨克斯坦的“一带一路”骆驼奶和格鲁吉亚的阿纳克利亚港。¹⁹这种含糊不清的态度为东道国民众的猜疑和不满制造了真空——这种反应在中亚大部分地区已经存在。²⁰在吉尔吉斯斯坦，一个价值2.75亿美元的中国物流中心最近在纳林省当地持续抗议后被取消。²¹2019年8月，抗议活动更具有爆炸性，数百名纳林居民冲进了中吉矿业的大院。结果，中国大使不得不到医院探望39名中国公民。²²

其次，如果没有与俄罗斯国家媒体的叙事统一，中国的公共外交是不可能成功的。NTV和总理梅德韦杰夫对AkvaSib进行干预，即使其他工厂早已构成类似的环境威胁，也让人怀疑2015年与中国媒体签订的协议中建立的“互信”精神。虽然不受控制的民族主义会成为一种破坏稳定的力量，但克里姆林宫确实表现出了一种能力，“在乌克兰危机期间激活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并在之后平息这种情绪”。²³这表明，如果俄罗斯国家媒体进行更加明确和协调的媒体宣传，也能达到类似的平息效果。中国的商业倡导者、外交官和中共宣传部可以私下联系他们在媒体交流年中培养起来的人脉，推进这一信息建议。

第三，双方的公共外交操作人员必须认识到，必须进一步让“伊万—伊万诺夫”和俄罗斯国内的普通公民-参与进来，为俄中合作出谋划策。对战略伙伴关系的浮夸庆祝，如12月的“西伯利亚之力”电视联播，显然与社会对中国的担忧不相协调，尽管与北京接触对推进莫斯科的战略利益有明显好处。媒体峰会和论坛的目的是通过将商人和专家聚集在一起，搭建社会桥梁，但日常的俄罗斯人有可能将其视为另一个精英项目。也许，通过增加俄罗斯高中生和大学生、教师以及小城市和乡村（尤其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当地记者到中国学习的项目，可以更好地

平息俄罗斯的恐中症。其他自下而上的措施还可以包括建设学校、医院或其他基础设施，这些都是伊尔库茨克州等地急需的。一位在2019年反对AkvaSib工厂的库尔图克市女议员（但支持其在2015年开业）回忆说，她曾要求该项目投资方也建一个公共澡堂。她的要求被拒绝了[15]。为了改善俄罗斯当地人对中国的看法，中国企业和BRI融资方应该考虑对这种要求更加慷慨。

可以反驳的是，上述俄罗斯人的抵触情绪与中国人的存在关系不大。毕竟，反移民情绪普遍在同步上升，而恐华症仍低于2013年10月的水平，当时45%的莱瓦达中心受访者呼吁限制中国人在俄居留。然而，怀疑“恐华症”严重性的人必须承认，无论是对莫斯科的国内议程还是其大战略来说，双边关系从未像2013年乌克兰危机后的孤立时期那样重要。俄罗斯统治精英们意识到，他们更需要中国的投资和市场，而不是相反。黑龙江对远东地区的相对繁荣，以及内部移民不断增加的吸引力，意味着到从其他地方赚钱对中国民营企业的诱惑力越来越大，尤其是考虑到COVID-19疫情刺激下的恐中症上升。

结论

这一分析回顾了中国在俄罗斯公共外交的一个关键点——2016—2017年媒体交流年，尽管如此，中国在俄罗斯的恐中症却在增加，并累积了两起中国在俄罗斯的公关丑闻。2018年的伊尔库茨克抗议活动显示了当地排外焦虑的力量，阻止中国中小企业的经营，甚至不惜牺牲俄罗斯东道主的旅游利润。第二年的瓶装厂抗议活动则进一步出现了联邦新闻频道和政府首脑与当地抗议者站在一起的罕见情况。围绕中国企业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负面新闻报道和舆论，与普京和习近平所谓“交情”所象征的、通过“西伯利亚之力”管道运作的宏大战略伙伴关系的说法并不一致。

与俄罗斯的双边经济、政治、安全关系对中国非常有利。两国经济具有互补性。俄罗斯是能源生产国和原材料出口国而中国则是能源消耗大的进口国。两国政权都有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即在各自地区排斥美国的军事力量投射能力。此外，作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这两个政权都有“不干涉”内政（即不提倡民主）和半专制下“稳定”的原则。”有了所有这些结盟的驱动，外界观察者（以及俄罗斯与中国结盟的支持者）很容易只关注俄罗斯对中国的积极战略认知，包括中国在俄罗斯“朋友和盟友”中排名第二[12]。”然而，在西伯利亚很明显，2001年以来双边关系中战略利益的趋同、半权威的政治价值观以及战略层面的成就，既不会导致也不会与社会对中国——尤其是中国人民和企业——看法的改善相关。

贝加尔湖事件的爆发揭示了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已经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中亚部分构

成了巨大的障碍。它们表明，当地的反华情绪是如何在缺乏中国意图细节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恐华情绪和整个民族主义一样，可以被当地的商业和政治企业家利用，而中国的项目则是附加损害。北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应对这一挑战：以普通俄罗斯人容易理解的方式详细介绍国家和私人投资；加强与俄罗斯媒体的协调，对中国投资的报道进行事实核查；通过教育项目和小城市及乡村的基础设施投资，说服俄罗斯公众理解中国的善意。

有趣的是，强调“西伯利亚电力”环保性和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的是习近平，而不是普京，而普京则着重强调该项目世界地位[11]。这说明了关键的启示。中国，特别是俄罗斯的精英们必须解决媒体对其大伙伴关系的过度关注与地方一级的社会经济焦虑之间的矛盾。

鉴于当地企业注册的模糊（但并非不透明）做法和公众对中国移民的可怕高估，这种趋势要求对中国在俄罗斯东部的参与进行更多研究。未来的中国对外宣传活动，以及俄罗斯对这些活动的反应，可以通过类似于威廉玛丽学院AidData项目的方法进行改进，该项目量化了中国在太平洋发达国家（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和发展中国家BRI投资接受国对其“和平崛起”叙事的宣传。¹⁵ 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俄罗斯公众认为自己是超级大国地位的继承者，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大国，他们在多大程度上首先想听中国崛起的故事。

参考文献

[1] BG Irkutsk. In Irkutsk, 60 people went to a rally in defense of Lake Baikal. 2018-05-22. <https://bg-irkutsk.livejournal.com/5974434.html>.

[2] Proekt, Спорное море. Репортаж об антикитайских настроениях на Байкале. Proekt Media, 2019-01-30. <https://www.proekt.media/report/baikal-kitay/>.

[3] Mezuda, How politics, money, and racism turned Irkutsk against a Chinese bottling factory at Lake Baikal. Mezuda, 2019-05-18. <https://meduza.io/en/feature/2019/05/17/xenophobia-masquerading-as-environmentalism>.

[4] President of Russia. Presenting the Order of St Andrew the Apostle to President of China Xi Jinping. President of Russia, 2017-07-04.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4973>.

[5] Liang Yu. Xi awards Putin China's first friendship medal. 新华网, 2018-06-08.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8-06/08/c_137240619.htm.

[6] Kent. E Calder. Super Continent: The Logic of Eurasian Integr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126.

[7] Samuel Charap, John Drennan and Pierre Noel. Russia and China: A New Model of Great-Power Relations. *Survival*, 2017 (59): 26.

[8] Michael S. Chase et al. Russia-China Relations. Assessing Common Ground and Strategic Fault

Lines. NBR Special Report, 2017: 14.

[9] Ivan Zuenko. Russia's Far East Seeks Partners Beyond China. Carnegie Moscow Center, 2020-03-13. <https://carnegie.ru/commentary/81278>.

[10] Sassi, Francesco. 西伯利亚的力量对中俄关系的启示 [What the 'Power of Siberia' Tells Us About China-Russia Relations]. *The Diplomat*, 2019-12-07. <https://thediplomat.com/2019/12/what-the-power-of-siberia-tells-us-about-china-russia-relations/>.

[11] President of Russia. Russian gas exports to China launched via the eastern route. President of Russia, 2019-12-02.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2163>.

[12] Levada Center. Xenophobia and Nationalism. Levada Center, 2020-09-23. <https://www.levada.ru/2020/09/23/ksenofobiya-i-natsionalizm-2/>.

[13] 人民网. China, Russia step up media cooperation with 9 deals inked. People's Daily Online, 2015-06-27. <http://en.people.cn/n/2015/0627/c98649-8912048.html>.

[14] 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Media's role in strengthening China-Russia ties. 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2017-11-01. http://english.scio.gov.cn/international-exchanges/2017-11/01/content_41827063.htm.

[15] Telegina, Natalya. Xenophobia Masquerading as Environmentalism: How Politics, Money, and Racism Turned Irkutsk against a Chinese Bottling Factory at Lake Baikal. *Meduza*, 2019-05-17. <https://meduza.io/en/feature/2019/05/17/xenophobia-masquerading-as-environmentalism>.

[16] Postnikova, Tatiana and Luk'yanova, Yulia. Report on Anti-Chinese Sentiments on Lake Baikal. Proekt, 2019-01-30. <https://www.proekt.media/report/baikal-kitay/>.

[17] Alexander Gebuev and Maria Repnikova. Why Forecasts of a Chinese Takeover of the Russian Far East Are Just Dramatic Myth. Carnegie Moscow Center, 2017-07-14. <https://carnegie.ru/2017/07/14/why-forecasts-of-chinese-takeover-of-russian-far-east-are-just-dramatic-myth-pub-71550>.

[18] Shepard, Wade. 中国如何失去对其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 [How China Is Losing Support For it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orbes*, 2020-02-28. <https://www.forbes.com/sites/wadeshepard/2020/02/28/how-beijing-is-losing-support-for-its-belt-and-road-initiative/#1d8993a32199>.

[19] Oyuna Baldakova. Protests along the BRI: China's prestige project meets growing resistance. *Merics*, 2019-12-10. <https://www.merics.org/en/blog/protests-along-bri-chinas-prestige-project-meets-growing-resistance>.

[20] Catherine Putz. Kyrgyz-Chinese Joint Venture Scrapped After Protests. *The Diplomat*, 2020-02-20.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2/kyrgyz-chinese-joint-venture-scrapped-after-protests/>.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吉尔吉斯共和国大使馆. Press-reliz Posol'stva KNR v KR ob intsidente napadeniya na kitaiskuyu kompaniyu Zhong Ji Mining" v Narynskoj Oblasti. 2019-08-06. <http://>

kg.chineseembassy.org/rus/zyxxfb/t1686600.htm.
[22] Marlene Laruelle. Putin's Regime and the Ideological Market: A Difficult Balancing Gam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7-03-16.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7/03/16/putin-s-regime-and-ideological-market-difficult-balancing-game-pub-68250>
[23] Custer, Samantha et al. Ties That Bind: "Ties That Bind: Quantifying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and Its 'Good Neighbor' Effect. AidData at William & Mary, 2018: 69.

中国的私募股权投资：监管制度对私募股权公司的影响

Hannah Bradford[1]和Riley McKinzie[2]

[1] Hannah是2021届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哲学和东亚研究专业的学生。

[2] Riley是2022届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国际关系和东亚研究专业的学生。

摘要：本报告研究了中国经济、私募股权以及中国监管制度对外资和本土私募股权公司的影响。为了对经济、金融市场和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有更细致的了解，我们逐一对它们进行了研究：第一部分梳理了中国经济增长在1978年脱离计划经济后的经济发展；第二部分解释了中国金融体系，包括银行和金融部门在内的历史和发展；第三部分中分别从西方和中国的角度对私募股权和投资方法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研究了外国和本地私募基金的资本增长和行业趋势；最后一部分讨论了新出台的《外商投资法》对当前和未来外商投资企业的影响。

关键词：私募股权；中国经济；全球金融体系；外国投资法

在线发布
2021年1月

参考资料

Bradford, Hannah and Riley McKinzie. 2021. "Private Equity in China: The Impact of Regulatory Systems on Private Equity Firms [中国的私募股权投资：监管制度对私募股权公司的影响]." IUCJ 1 (Winter), 27-35.

中国和中国经济简介 简述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经济经历了非凡的增长和发展。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扩大其金融和银行业，中国自2000年代初以来的经济增长几乎超出了所有的预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现在的GDP排名、¹商品贸易和外汇储备都排名世界第一。²中国不仅在GDPPP以27万亿美元（2019年）排名世界第一，而且中国的GDPPP比美国（21万亿美元）高近6万亿美元[2]。虽然中国的实际GDP增速开始放缓，但中国的增速仍然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国家。

1979年以前，中国实行经济国有化和经济保护主义，大部分的经济是通过“中央计划”由国家控制。³这使得中国政府能够将资源分配给关键产业和基础设施以促进发展和增长。这些政策的实施是为了确保中国经济可以相对自给自足，不依赖对外贸易。虽然中国在1949-1978年间发展了一些现代工业和基础设施，而且名义GDP年增长率达到6.7%，⁴但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计划经济是低效的。按照西方标准，1949-1978年间的中国仍然是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

1978年，中国开始了包括农业改革、开放部分市场经济、建立四个经济特区、部分贸易自由化等在内的“改革开放”时代，这些都使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GDP年增长率为9.8%；因此，中国的经济规模每八年就会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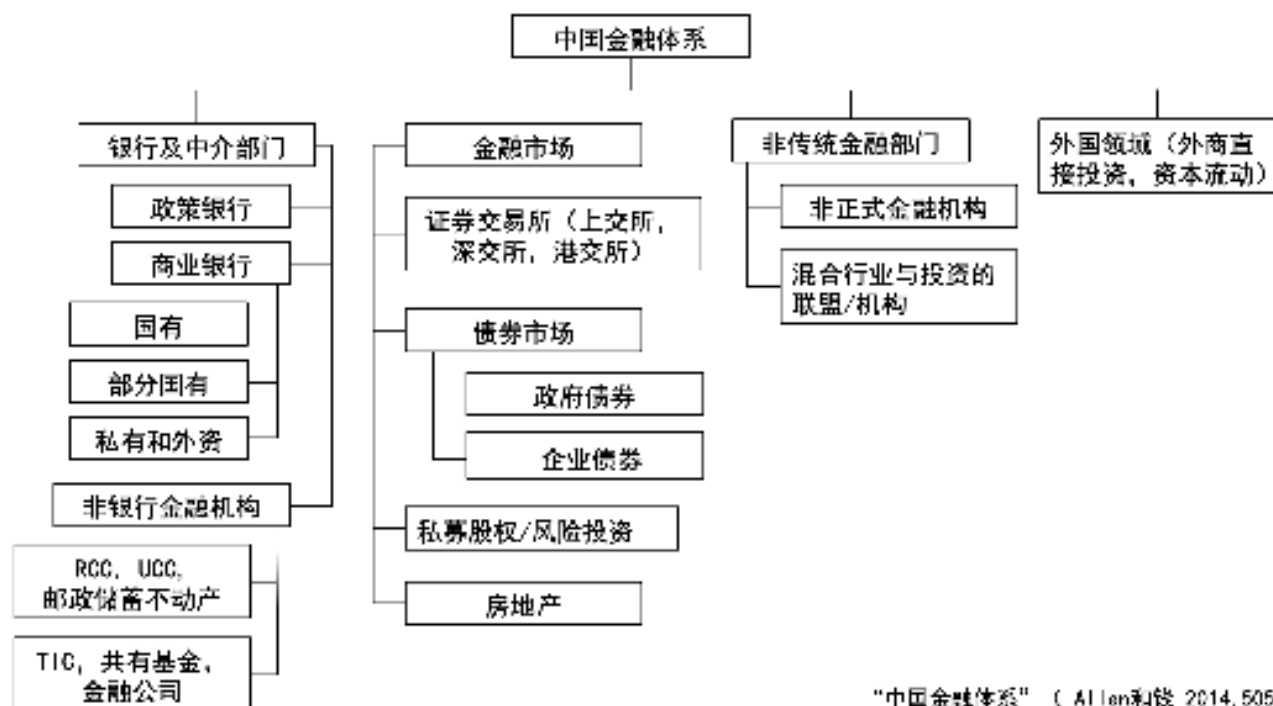
一番[4]。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出台了586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重点是投资基础设施和放松银行贷款，这使得中国经济得以迅速复苏，GDP增速迅速回升[4]。尽管如此，过去六年中，中国的GDP增速有所放缓，2019年的增速为6.1%[4, p.9]。许多经济学家提醒说，如果与美国的贸易紧张局势持续下去，那么中国的实际GDP增速可能在2021年下降到5%[4, p.6]。

中国的政策和计划在过去40年里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大幅增长，而且中国现在也允许增加国内自由市场活动和国际贸易。世界银行将中国的经济增长描述为“历史上主要经济体最快的持续扩张[4, p.11]。”例如，中国最近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寻求几个高科技领域的增长，如现代制造业、农业机械、基础材料产品、高科技海洋船舶、电动汽车、电池和发动机、医疗设备的核心部件、高性能计算机、工业机器人、先进医疗器械等[2, p.1]。

国家主导的发展

1978年，中国开始逐渐摆脱计划经济。⁵如今，中国利用国家主导发展的方针来促进经济增长。国家主导的发展一般被认为是宏观经济规划，允许国家通过激励、投资或所有权来引导经济和某些行业或项目。但是，中国并不像在“计划经济”时那样对商品和服务的规划、生产和分配拥有唯一的控制权。在国家主导发展的方针下，中国采用了多种机制，如建立经济特区和自

图1：中国金融体系概览



由贸易区，设定短期、中期和长期发展计划和首要任务，对某些行业项目采取激励措施以及对国家战略重点行业拥有所有权和投资权（如电信业通常是国有企业）。⁶所有这些机制结合在一起使得中国政府能够在不采用“计划经济”或直接下达经济命令的情况下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

1978年至1990年左右的快速发展主要集中在农业改革、逐步摆脱“计划经济”和建立支持国际贸易的经济特区。中国政府开设了四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以促进对外贸易。在这些经济特区成功之后，其他几个经济特区也相继建立来更好地推动中国经贸融入世界。既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2001年中国加入WTO进一步刺激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参与度。

中国还不断向经济价值链上游移动，以确保其经济增长不会停滞不前。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从农业部门转向制造业部门，再转向服务业部门。目前，服务业约占中国GDP的52%。此外，中国还通过制造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来优化经济结构。中国政府也通过投资建设项目来刺激就业，支持经济增长。通过鼓励私营和国有部门的发展也使中国发展出了多元化的“混合”经济。这种转变鼓励了就业增长，大约90%的新工作岗位来自私营部门。一个常见的误解是外国直接投资是私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外国直接投资（FDI）一般占GDP的2%-3%，如果占5%-6%之间则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作用。自2000年初以来，

中国的FDI占GDP比重一直在2-4%之间徘徊。⁷近年来，分析人士估计，中国的国有部门占GDP的40%左右，而私人部门占GDP的60%左右。

金融体系 银行业务

银行部门和金融部门构成了中国的金融体系，这些部门共同鼓励和促进投资。中国的金融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银行业主导的，而且银行业的规模仍然远远大于中国的金融市场。

1949-1978年间，中国的银行体系由一家大型国有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组成，它的资产占中国金融总资产的93%。⁸中国人民银行能够控制几乎所有的个人和商业金融交易。从1978年到1984年，银行业进行了重大改革。作为中国摆脱“计划经济”的一部分，中国人民银行于1979年正式与财政部脱钩[8, p.504]，同时成立另外三家国有银行：

1.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2. 中国农业银行
3. 中国工商银行

这三家银行开始处理大部分的商业银行业务。在此期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成为中国的中央银行。这一转变使个人和企业有更多机会获得贷款和银行服务。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不断推动银行体系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银行业进一步发展，

三家政策性银行（中国开发银行、中国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三家专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成立。⁹此外，一些农村和城市合作社也相继成立。虽然在此期间银行系统在扩张，但中国政府仍然控制着大部分行业并向低绩效的国有企业提供贷款，这导致许多低绩效的国有企业贷款违约和倒闭。为了应对这一情况，财政部对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重组，¹⁰并提供了330亿美元的资本金来消除不良贷款[9, p.1615]。通过这些改革，目前中国已有一百多家商业银行获准经营。虽然银行系统在不断扩张，但中国人民银行仍然是银行系统的中央机构。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制定货币政策，降低风险和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定，监管贷款和外汇，以及监督支付和结算系统等[9, p.1614]。

对中国银行系统的改进建议往往强调提高效率的必要性，特别是在贷款分配方面。由于大部分银行信贷都给了国有企业，这些贷款经常不还或迟迟不还，于是就有人猜测给国有企业的贷款可能是基于个人关系，而不是商业价值。此外，贷款的整体需求大于供给。在许多企业无法获得贷款的情况下，近年来其他银行中介机构迅速发展，以满足这种资金需求。

金融市场

近年来，中国的金融业发展迅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本地企业和外国企业之间允许进行自由投资。中国的金融市场由三个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香港交易所）、债券市场、风险投资/私募股权以及房地产组成[8, p.501]。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金融体系见证了内地两个新的证券交易所（上交所和深交所）和房地产市场的同步发展[8, p.501]。然而，中国股票交易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往往波动性高，部分原因是由于相关法律框架还在不断发展中。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允许外资金融机构更频繁、更大规模地进入股票和房地产市场。此外，在2001年，中国允许机构投资者在退出投资后自由撤出资金。¹¹这使市场从封闭式基金系统过渡到开放式基金系统。这一转变为

图2：私募股权的架构



根据James Baldwin“什么是私募股权架构”（P5）绘制

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使总资产净值从1998年的13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3320亿美元。¹²虽然与银行行业相比，私募股权只占资产的一小部分，但私募股权的发展标志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变化。

私募股权 中国私募股权投资的历史

随着中国金融业不断发展，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沿用了全球最为通行的西方私募股权模式。然而，中国模式的一大特点在于中国热衷于开创自己的道路，这一点在私募股权投资行业也表现得非常明显。不同的监管环境和私募股权的发展历程导致了中西方私募股权的根本差异。¹³虽然中国从1978年就开始经济增长，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引入私募股权投资。国务院首次引入广义的私募股权投资是为了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并提供更多的融资机会[13, p.79]。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中国的金融从业者对私募股权投资知之甚少，或存在误解。私募股权在中国的兴起与2007年中国投资公司（中投公司）和全球领先的私募股权公司黑石公司的交易有很大关系。¹⁴这笔交易之所以被媒体高度关注，主要有因为两大原因：1. 中投公司为收购黑石公司约10%的股份支付了高达30亿美元的金額；2. 这是中投公司的第一笔投资交易，而且发生在中投公司正式注册成立之前。因此，这笔交易引起了公众对于黑石公司的兴趣，不少国内企业也由此了解到了私募股权这一新资金来源渠道。包括私募股权公司在内的外资企业非常希望有机会投资国内企业，而这对于以前几乎完全依靠国有银行融资的国内企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新选项。由于中国的资本市场刚起步，外资私募股权的进入为中国企业提供了真正的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资金的增加、管理技能的提高以及金融业整体专业性的提升。

中国的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的类型：所有权和货币

中国的基金主要按所有权和货币这两种性质分类。外国投资者对一支外国基金拥有完整所有权。中国认为任何不是中国公民的投资者都是外国投资者。在本文中，当我们讨论外国所有权时，我们指的是美国投资者。不过，原则上任何外国私募股权基金都可以投资中国股本。中国投资者对一支本地基金拥有完整所有权。¹⁵一支基金可以由外国和本地投资者混合持有，成为混合型基金。区分所有权是必要的，因为从过往案例看，所有权决定了哪些公司需要遵守特定的中国金融和市场法规。¹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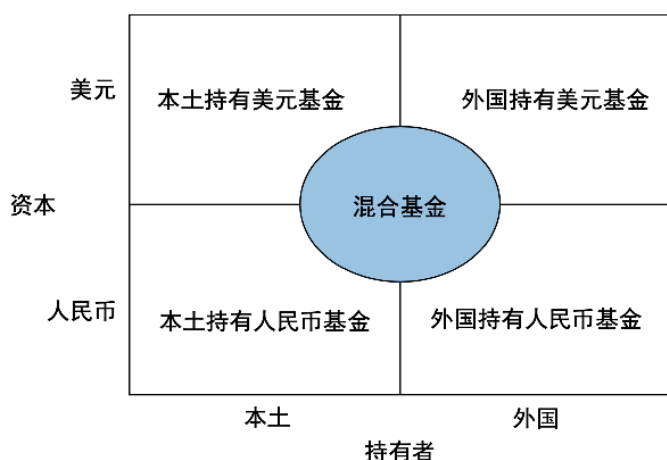
在所有权确立后，私募股权基金需要决定

是以美元、人民币或两者结合的方式来募集资金。外资和本土基金都可以用美元或人民币募集资金，并不必根据国籍来决定募集资金的货币形态。在选择募集货币时，私募股权公司可能会考虑到自己的退出计划和可兑换货币的需求。以美元和人民币组合募集的基金很可能是外资和本土投资者共同拥有的混合基金。由外资或本土投资者独资的基金一般不会用两种不同的货币募集资金。

根据下图，私募股权基金可分为以下几类。大部分基金属于1号、3号或5号；

1. 外资美元基金

图3:中国私募股权基金形式



根据Yong “中国私募股权基金” (P98) 绘制

2. 外资人民币基金
3. 国外/本地美元和人民币混合基金
4. 本地美元基金
5. 本地人民币基金(私人或国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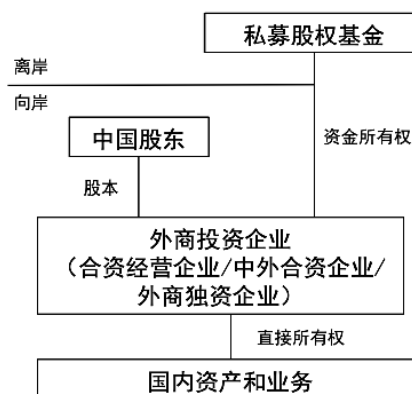
结构：在岸公司和离岸公司

私募股权投资以离岸公司或在岸公司的形式合法设立。离岸结构使私募股权公司能够避开中国的资本利得税和冗长的表格和法规，更快地转让股权，并在货币兑换方面获得更大的灵活性。离岸结构通常“为通过IPO或贸易销售退出投资提供了一条更快捷的途径”。外资和本土企业都可以使用离岸结构，但本土企业用离岸结构较少。在过去十年中，中国政府逐渐意识到离岸结构会带来的资本利得税的流失，因此对相关法规进行了改革。

在中国合法注册的私募股权公司（既“在岸结构”）根据所有权和目标行业的不同有不同的结构。在中国，外国在岸企业被称为外商投资企业（Foreign Investment Enterprises 简称FIE。

外商投资企业是一个总称，指在中国境内根据中国法律注册成立的企业，其全部或部分投资来自外国投资者。¹⁷ 私募股权公司采取的外商投资企业类型将根据所有权而有所不同。例如，外商独资企业（Wholly Owned Foreign Enterprise 简称WFOE）由外商独资出资，而合资企业（Equity Joint Venture 简称EJV）则由外商和本地合伙人出资。

图4：向岸的外商投资架构



根据雍桂平 “中国的私募股权投资” (P102) 绘制

每个外商投资企业都有相应需遵守的法律。例如，以合资经营企业形式成立的公司必须遵守1979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资企业法》。对于合资经营企业，外国投资者需要至少出资25%。相关法律规定，“利润和亏损按照各合伙人的出资比例进行分担。” 每项法律都对出资、所有权结构、必须遵守的其他法律等进行了明确规定。上图列出的结构并不是一份详尽的结构，但却是外商投资企业中最受欢迎的结构。

投资过程

外资和本土私募股权公司在募资和设立基金的过程中总会面临挑战。如果外国公司试图在中国筹集资金，他们将面临作为局外人的种种挑战，比如他们无法有效地与投资者建立联系，尤其是在他们不懂中文的情况下。通常外国投资者在中国以外的地方筹集资金更成功，而中国金融专业人士在中国筹集资金更成功。

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可以严重影响外国基金在目标公司实行的增值和提升业绩的方法，但外国公司往往具有专业知识上的优势。在私募股权投资领域，知识和经验是至关重要的。不仅要成为私募股权投资领域的专家，而且要在公司投资的行业中拥有丰富的背景，这一点越来越重要。

在中国，对一家公司进行充分估值的过程是十分复杂的，因为财务报表往往会掺杂编造和美化成分，或者有些中国公司直接拒绝公布财务报表，这都会使得外国投资者保守谨慎。不

图5：评估调整机制



计量指标	情景A	A的可能结果	情景B	B的可能结果
财务指标（收入，利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管理层达到目标	A：投资者给管理层第二轮投资	管理者没有达到目标	B：投资者收到更多股份或者管理层放弃股东的位置
非财务指标（质量，专利）	管理层获得新的专利	A：投资者发股权给管理层或者增加第二轮投资	管理层没有达到质量目标	B：管理层不能从投资人那里收到投资
赎回和补偿（优先股，股利）	管理层不能用现金支付股利	A：管理层用股票支付股利给投资者	管理层不能赎回优先股	B：管理层放弃股东的位给投资者
股权发布（首次公开募股，股价）	管理层达到目标股价	A：投资者可以卖出股票或者管理层买回投资者的股票作为补偿	管理层不能在五年时间内公开募股	B：估值调整机制合同作废

“中国私募股权基金”（Yung 2012, 115）

确定性通常需要通过正规的交易来源和充分的尽职调查来消除。尽管有这些顾虑，但私募股权公司可能会同意采用估值调整机制（valuation adjustment mechanism 简称VAM)以帮助“降低风险”[13, p.115]。估值调整机制可以采取金融或非金融措施，下图总结了估值调整机制的可能情况。

在中国，私募股权投资通常是“具有某种形式的广泛控制权的少数成长型资本，或者是IPO前的投资。”由于大多数交易采用少数股权结构，私募股权公司对投资公司的影响力经常受到质疑。私募股权公司在构建交易结构时旨在确保控制权，因此通常会在协议中设定合同义务。此外，当私募股权公司拥有少数股权时，他们会寻求确保积极的投资组合管理和与投资对象间开放的沟通。在特定的投资期限内，合伙人往往会希望进行投资重组，准备退出。

美元基金和人民币基金的目标退出策略通常会有所不同。人民币基金很可能会在国内退出。如果基金决定进行首次公开发行，它很可能在国内交易所（比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因为国外交易所的成本很高。但是，中国证监会会有更严格的规定，所以人民币基金需要遵守规定，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会被拒绝。随着2010年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的成立，贸易和二级销售作为人民币基金的退出策略越来越受欢迎。贸易销售要快得多，成本也相对较低，而且向战略买家的贸易销售可以以现金支付（股权互换在中国并不常见）[13, p.179]。杠杆收购是人民币私募股权基金中最不常见的退出结构，这主要是因为这类基金在投资中持有少数股权，因此杠杆收购并不是必要的。基金通常选择少数股权以提高交易完成

和退出的效率。

美元基金最常见的退出策略是通过首次公开发行或交易销售。通过首次公开发行退出意味着投资将首次在公开交易所上市。投资公司不需要在其地理位置附近的交易所上市，实际上，许多公司会根据其行业或目标受众选择上市。常见的中国大陆境外的证券交易所有纳斯达克、纽约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证券交易所。中国大陆境内最受欢迎的股票交易所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2019年，在上交所上市的企业有120家，在深交所上市的企业有77家，¹⁸ 这些IPO上市带来了约400亿美元的收入[18]。

贸易销售通常在境外进行以避免税收和法规，但有些交易仍需要中国证监会的批准。股权和所有权将通过一个离岸实体转移给买方。然后，买方将通过离岸控股公司将股份回流，使其回到中国[13, p.1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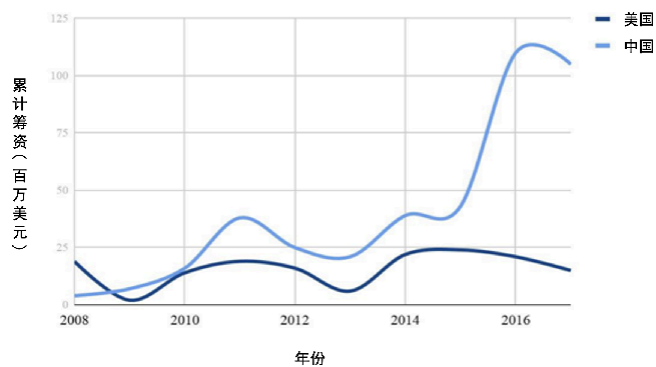
与首次公开发行和交易销售相比，二次销售和杠杆式资本重组不太常见。二次出售比较低调，所需的法规较少，与其他退出方式相比相对简单。二次出售一般发生在两家私募股权公司之间，而且与其他退出方式相比，二次出售更为直接。交易条款可以由双方协商，不需要政府干预，从而实现盈利退出[13, p.131]。

对于经过管理的资本重组退出，中国对股东的支付分配有严格的限制。中国的法规往往不允许在任何时候撤回股权，这就带来了额外的障碍。此外，公司一般没有足够的流动资金来进行杠杆式资本重组[13, p.132]。

近年来，在中国运营的几家领先的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有黑石集团、凯雷集团、贝莱德、贝恩和瑞银。¹⁹黑石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之一，在全球范围内管理着950亿美元的资产，是在中国运营的主要外国私募股权基金。²⁰庞大的资金使其成为中国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尤其是房地产市场）最具影响力的外资基金之一；然而，黑石公司在中国参与了涉及多个行业的几笔重大交易。近期的两笔交易包括：黑石公司于2017年将其欧洲物流公司Logicor以145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中投公司以及黑石集团在2016年以65亿美元的价格向中国公司海航集团出售希尔顿全球25%的股份[20]。

在中国，自2014年以来，外资美元私募股权基金的资产管理规模和募资数额均有所下降，²¹而同期本土人民币基金的资产管理规模和募资数额均有所增加。²²2018年，中国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的资产管理规模为6000亿美元[22]，其中大部分资产管理规模的增长来自于近年来本土人民币基金募集的增加。²³美元募资额有所下降，2008年募资额为180亿美元，2017年募资额为150亿美元[22, p.8]外资基金的资产管理规模和募资额下降的原因是投资法规复杂，外币基金的货币转换时间较长。另外，2014年IPO热潮中释放的资金，使资金从美元基金转向国内人民币基金。此外，西方企业对中美贸易争端的担忧也导致了私募股权投资的减少。²⁴再者，在2018-2019年间，外国私募股权投资减少了64%，2019年其在中国的投资额为50亿美元[22, p.9]。2015年，在中国运营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超过1300

图6: 国外的中国本土私募股权累计筹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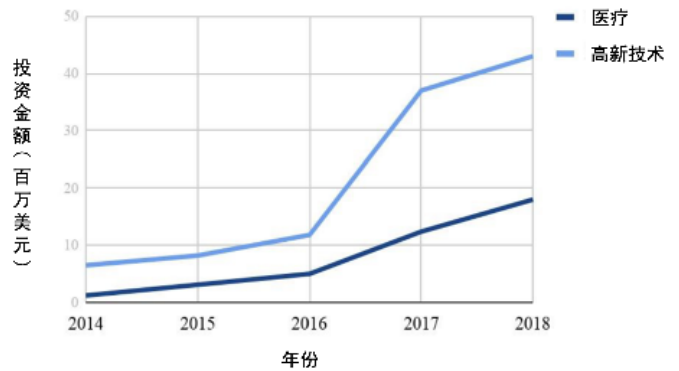


家，其中外国基金约占400家。这些外资基金平均管理着1亿美元的资产[23, p.13]。

近年来，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在中国投资的主要领域是消费、医疗和科技[19, p.3]。在新兴行业中，排名靠前的是医疗和高科技。2018年，医疗保健行业的总投资额为430亿美元，外国基金占总投资额的180亿美元[22, p.16]。2019年，医疗保健行业的投资额又增长了22%，其中对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的投资额占了很大比重

[22, p.17]。这一增长部分可以归因于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爆发。例如，在中国运营的最大外资企业之一黑石集团向中国增长最快的制药公司之一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了

图7: 国外私募股权在医疗和高新技术上的投资



4亿美元[20]。这项投资说明了有影响力的外国公司投资中国新兴产业的趋势。

国外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投资正在快速增长。²⁵信息技术是高科技行业的主要市场之一。2018年，信息技术行业的总投资额达1030亿美元，外资基金占总投资额的430亿美元[22, p.22]。此外，在2013-2017年间，对中国的互联网和科技交易已占外国私募股权投资增长的85%[25, p.13]。互联网和科技交易的平均投资交易规模从2013年的3000万美元上升到2018年的2.13亿美元[25, p.17]。贝恩公司的调查显示，由于传统的私募股权估值方法与中国市场估值存在差异，约85%的私募股权投资者认为很难评估中国的“新经济企业”[25, p.13]。然而，中国的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正在不断发展，并为各行业的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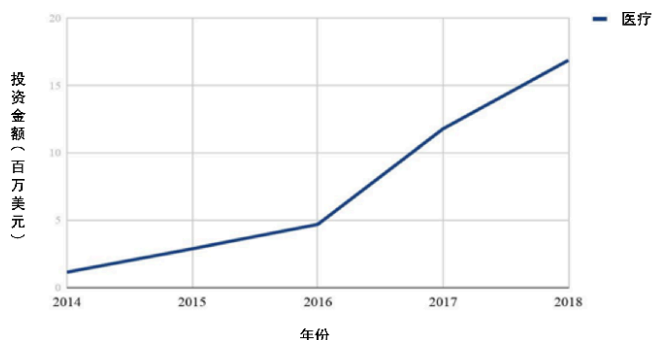
本土私募股权公司

本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私募股权市场上的影响力持续增强，其资产管理规模、募集资金、退出交易额均有所增长。近年来，中国本土私募股权投资的领军企业有：弘毅投资、中信资本、²⁶博裕资本、九洲创投[23, p.9]。弘毅投资拥有120亿美元的资产管理规模。²⁷这些资金使弘毅投资投资了100多家中国公司，成为了行业领军者。他们的投资组合是多样化的，在2015-2019年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对西方公司进行海外投资的趋势中，弘毅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弘毅投资2014年对英国的PizzaExpress进行了10亿美元的投资[27]。弘毅战略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跨境投资。在中国，自2000年以来，本土人民币私募股权基金的资产管理规模和募资额都在增加[22, p.7-8]。2018年，中国6000亿美元的资金管理规模[22, p.16]中的大部分来自于本土人民币基金近年来的增资，2008年增资40亿美

元，2013年增资210亿美元，2017年增资1050亿美元[22, p.20]，这些增资的原因是本土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加速成熟，本土基金管理人扩大了本土企业的规模，以及2014年中国国企IPO热潮后资本的涌入。2015年，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超过1300家，其中本土基金约占900家。本土基金的资产管理规模从3200万美元到9000万美元不等[23, p.14]（见图8）。

近年来，中国本土私募基金投资的主要行业有医疗健康、自由消费、科技、媒体和电信[19, p.4]。这与国外基金的投资趋势类似，本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也瞄准了医疗和科技行业。2018年，医疗健康行业的总投资额为430亿美元，本土基金的投资额占总投资额的170亿美元[22, p.16]。2019年，医疗健康行业的投资资本又增长了22%，本地基金占投资资本总额的210亿美元[22, p.23]。这种增长可以通过本土私募股权投资公司：中信资本和正心谷资本的投资看出。中信资本对哈尔滨制药投资4.47亿美元，正心谷资本对康方生物投资1.5亿美元。这些投资表明了本土私募股权投资和中国政府在帮助医疗行业投

图8: 本土私募股权在医疗上的投资



资方面的作用。

法律和监管制度 各部和委员会

中国的法律制度是比较新的，因为中国的法律制度是在1978年以后才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开始现代化的。当前的中国法律体系与西方法律体系的标准不同。然而，中国政府已经努力提高制度的先进性，减少不一致的地方。这一点在外商投资法规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过去五年实施的新法律法规旨在为本土企业和外国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所有的“法律”都是由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²⁸所有的“行政法规”都是由最高行政和执行机关--国务院发布的[28, p.1]。”国务院负责监督各监管委员会和部委[13, p.285]。众多部委，每个部委负责不同的部门或职能。以下图11和图12显示了监管金融市场、外国投资

和外国企业所必需的法律法规和部委。²⁹

外商投资法

表1: 中国的监管机构

规范中国金融市场	规范外商在华投资
中国证监会 (CSRC)	商务部 (MOFCOM)
中国人民银行 (PBOC)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发改委)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CIRC)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商业局 (SAIC)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发改委)	国家外汇管理局 (SAFE)
中国银监会 (CRBC)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办公厅 (国资委)
中国资产管理协会 (AMAC)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SAMR)

表2: 私募股权立法

外贸企业	监管程序
外商投资法	国家负面清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自贸区负面清单
证券法	
契约或合资企业经营法	
外商独资企业法	
合资企业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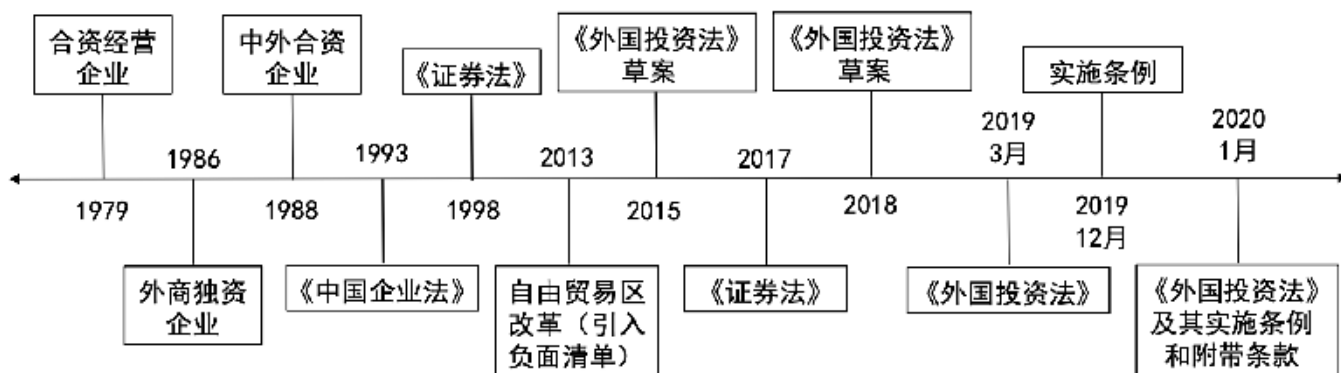
2020年1月1日颁布的《外国投资法》导致以前所有的外国投资法被废除。这些法律包括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³⁰所有这些法律以前都是对外国投资和外资流动的管理法。³¹外商投资法的出台是中国迄今为止在公司治理和外商投资方面最重要的改革之一。外商投资法适用于所有在中国进行外商投资的公司，并使这些公司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约束。外商投资法的目标是在外国公司和本土公司之间实行平等待遇。这些法规基本上是相同的，只有一些不同的其他规定。外商投资法的附属规定罗列了外商投资和本土投资不太相同的一些领域。下文强调的规则并非包括所有，但具有代表性。

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附属规定示例[31, p.1]

信息报告 关于外国投资信息的报告事项的公告。³²

外商投资企业注册 → 国家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实施外商投资企业注册有效工作的市场监管通知。³³

图9：重要外商投资规定时间线



根据普华永道中国“私募股权基金网络研讨会系列”相关内容绘制

司法解释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若干问题的解。³⁴

清理 → 商务部废止具体规定的决定。³⁵

根据《外商投资法》，外商投资将包括：
 外国投资者单独或者与其他投资者共同在中国境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外国投资者取得中国境内企业的股份、股权、财产份额或者其他类似权益；
 外国投资者单独或者与其他投资者共同在中国境内投资新建项目；
 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的投资。

目前还不清楚可变利益实体(VIE)、³⁶ 返程投资、目前在国外的中国公民的投资或外国政府组织是否会被视为外商投资法下的外国投资。对可变利益实体的定性可能会引起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的兴趣，因为他们通常使用这种结构。

外商投资法的关键组成部分可分为四个：投资促进、投资管理、投资保护和法律责任。投资促进包括对外国和本土资金的平等待遇和提高立法程序的透明度。投资管理包括市场前国民待遇准入和负面清单管理；^{37 38} 新的投资报告制度；国家发改委以项目为基础的法规；行业特定法规；以及继续规范本土和外国公司的公司结构。投资保护包括资金汇出、知识产权保护和政府合法承诺的履行。³⁹ 根据外商投资法，法律责任旨在使监管体系现代化，保护公司免受不公平或苛刻的限制，并创造平等的法律分配（包括政府）[31, p.1]。在所有这些变化中，外商投资法最大的影响是对公司治理结构的调整。

自2020年1月1日起，《外国公司条例》成为所有现有外国公司和所有新设外国公司的总领法

律。在此之前，现有公司有五年时间更改注册和结构，以符合外商投资法并遵守中国公司法。

结论

中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这种增长迅速扩大了金融体系，并产生了对全面监管体系的需求。1978年，中国摆脱了“中央计划”的束缚，标志着经济快速发展的开始。在国家主导的发展下，中国实施了经济特区和自由贸易区各种发展计划，以及政府在特定行业实施激励措施。诸如此类的措施使中国能够影响发展，包括经济体系中的私营和外资部门的巨大增长。在1978-2018年，中国的GDP平均增长率为9.8%。然而，这种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伴随着金融系统（包括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类似的监管加强。

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向成熟的大中型企业投资，将风险降至最小。私募股权投资公司获得公司的所有权，积极参与公司的管理，以改善其财务业绩。然后，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出售公司或其公司的股权以退出。

在中国，在中国本土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发展之前，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就已经进入了市场。这导致外国和本土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有不同法律法规。此外，一些外资企业如果与本土企业分享其知识，则允许进入中国。中投公司在2007年收购黑石公司10%的股份就是一个例子。中国的外资和本土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拥有许多相同的市场利益，特别是在医疗和科技领域。然而，目前本土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的规模已经超过了外资行业，并且发展迅速。

从2020年1月起，中国正试图根据相同的法律对外国公司和本土公司进行监管。新的外商投资法为外国公司和本土公司建立了标准化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前所有关于外国投资公司的法律都不再有效，现有公司有五年时间改变注册和结

构，以与外商投资法保持一致，并遵守中国公司法。这些新的法律法规的影响还有待观察；但是，随着对外资和本土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的明确和平等的法律法规，外资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可能会在中国再次增长。

参考文献

- [1] 购买力平价比较世界各地货币的购买力，以确定其理论汇率，使其能够购买相同数量的商品和服务。
- [2]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s. Made in China 2025 Industrial Policies: Issues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s, 2020 : 11.
- [3] 从1953年开始，中国采用了“中央计划”，有时也被称为“命令经济”。在“中央计划”下，政府拥有并集中规划所有的生产，包括每一个单位、价格、装运等。这种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逐渐被打破。
- [4] Wayne M. Morrison. 中国的经济崛起：历史、趋势、挑战和对中国的影响[History, Trends, Challeng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国会研究局，2019: 6.
- [5] 在国家主导的发展下，政府通过奖励和/或投资来引导经济和某些行业。
- [6] 中国的“战略”产业包括电信、金融、能源、原材料和基础设施。
- [7] Susan V. Lawrence. China'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Leaders in Chart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3: 4.
- [8] Franklin Allen and Jun Qian.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and the Law. 2014: 503-504.
- [9] 陈丽丽和斯坦文森. An Overview of Chinese Banking System: Its History, Challenges and Risks.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2016: 1614.
- [10] 这四家银行包括中国人民银行、ABC、中行和工行。
- [11] 机构投资者是指PE基金的大型认证投资者，包括养老基金、银行、富裕的个人等。
- [12] 资产净值 (NAV) 是指PE基金内所有资产的现值减去所有负债的价值。
- [13] 雍桂平. 中国的私募股权投资：挑战与机遇. John Wiley & Sons, 2012: 77.
- [14] 中投公司是一家主权财富基金，资产规模约9400亿。
- [15] 本地基金通常被称为国内基金、中国基金，偶尔也有其他表示国内所有权的术语。
- [16] 新的FIL旨在为外国基金和本地基金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因此这应该不再是一个大问题。然而，目前还不清楚新的外国投资基金是否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我们要等到五年过渡期结束后才能知道。
- [17] 周倩. 如何解读中国新的外商投资法. 德赞世联律师事务所China Briefing, 2019.
- [18] EY. 全球IPO趋势. Ernest Young, 2019.
- [19] 摩根大通. 中国公募和私募股权投资的机会. 摩根大通, 2019: 3.
- [20] Blackstone. 私募股权投资. Blackstone, 2020.
- [21] AUM也被称为基金规模。
- [22] Preqin.大中华创新经济中的私募股权与风险投资. Preqin Ltd, 2019: 7-8.
- [23] Herbert Smith Freehills. 大中华区私募股权投资评论. 2018: 9.
- [24] Maria Madi. Private Equity and Venture Capital in China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Sino-American Trade Disputes. 2020: 75.
- [25] 贝恩公司.全球私募股权投资报告. 贝恩, 2019: 12.
- [26] 中信是一家由财政部控股的私募基金公司。
- [27] 弘毅投资. 私募基金. 2019
- [28] Michael Fosh and Katherine Yang.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PRC Government and Legal Structures. Reed Smith, 2017.
- [29] 这个名单并不全面，但是我们认为在了解金融业方面最重要的部委、委员会、法律和项目。
- [30] EJV、WFOE和CJV都是外商投资企业 (FIE) 的结构。每种名称相同的外国投资企业结构都有相应的法律。
- [31] PWCCN. 私募基金网络研讨会系列. 普华永道中国, 2020.
- [32] 商务部. 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9(68).
- [33] 郭思建.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切实做好外商投资企业注册登记工作落实外商投资法的通知. LexisNexis, 2019(247).
- [34]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解释.法释, 2019 (20)
- [35] 对原产于美国的太阳能级多晶硅进口反补贴措施的终审立案. 中国经济周刊, 2009(1).
- [36] 当投资者虽然没有投票权，却拥有合同控制权时，就会发生VIE。通常情况下，中国国内公司会被外国投资者控制。这是为了避免资本和行业限制。
- [37] 根据Matthew Dresden和Sara Xia的说法，国民待遇”意味着只要所投资的行业不在负面清单上，外国投资者在”准入阶段”就会受到不低于中国投资者的待遇”。这意味着，中国政府不能因为外商投资企业是外商而正式歧视他们。没有任何不在负面清单上的歧视性法规被废除。
- [38] 负面清单控制外资企业可以投资哪些行业。
- [39] Matthew Dresden and Sara Xia. How China's New Foreign Investment Law Affects You (Or Not). China Law Blog, 2020.

世界对老挝的亏欠

江映月[1]

[1] 江映月是2022届昆山杜克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

摘要：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以军事干预为由，在东南亚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并巩固其势力和信誉。虽然这场战争在越南北部和南部发生，老挝成为这一时期受到轰炸最严重的国家。本文研究了这些轰炸任务及其影响。这篇文章旨在明确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在促进合作方面所承担应承担的责任。为作为受害者的老挝提供有效的补救措施，并在此过程中支持老挝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秘密战争、国际人道主义法、集束炸弹、未爆弹药、橙剂、赔偿权

在线发布
2021年1月

参考资料
Navarro, Laura. 2021. "What the World Owes to Laos [世界对老挝的亏欠]." IUCJ 1 (Winter), 36-41.

简述

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以军事干预东南亚为由，将其作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巩固其权力和信誉的手段。¹虽然战争理论上发生在北越和南越，但现在公认的是美国还对柬埔寨和老挝进行了军事干预。比如说，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在这一时期成为世界上被狂轰滥炸最惨烈的国家[1]。因为这些轰炸主要违反的是关于老挝中立的日内瓦协定，它没有被公之于众，也因此在此后来被称为“秘密战争”。²

虽然美国已经承认它主要对越南负有一定责任，在柬埔寨也有少部分责任，但直到2016年，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才成为第一位公开承认美国在老挝投下超过100万吨炸弹的美国总统。此外，他还将美国的资金增加了一倍，用于清除每天都在新致人死伤的UXO（未爆弹药）。³然而，与提供给越南的援助相比，老挝获得的资金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有人认为，美国没有为他们在老挝的行动承担起全部责任。⁴另一方面，因为内部对美国在东南亚的行动存在怀疑，老挝政府在某些情况下拒绝美国的援助。⁵

本文将探究美国于20世纪在老挝的轰炸任务及其影响。目的是确定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在促进国际合作以赔偿战争受害者、实施制裁、减轻战争遗留物的影响和支持该国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责任。为此，本文将对战争罪、对外援助、责任和赔偿等概念进行回顾，并确认相关事件、施事者和法律。最后，将对老挝的赔偿进展进行评估，并对日后的补偿提出可能的建议。

秘密战争

从文件档案上看，越南战争发生在1965年至1973年间，地点在越南和柬埔寨。虽然冲突在1973年《巴黎和平协定》后正式结束，但现在已知战斗一直持续到了1975年[1]。此外，最近老挝

被揭露在整个战争期间遭受了猛烈轰炸。⁶对老挝的军事干预被称为“秘密战争”，因为它直接违反了1962年的《老挝中立国际协定》[2]。

事实上，老挝是美国在破坏胡志明小道上对越供应链的一个战略目标[1]。因此，尽管美国是《老挝国际中立协定》的签约国，但美国空军早在1964年就开始轰炸老挝，并一直持续到1975年。⁷据估计，到战争结束时，老挝有十分之一的人口被杀，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受重伤，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成为难民。⁸

由于在老挝的战争行动属于中央情报局的秘密任务，这些事件在战争结束后的40多年里一直没有得到官方承认[2]。虽然美国政府从1993年开始向老挝提供财政援助，并在2016年公开承认了自己的行为，但到目前为止，正式的赔偿和制裁还未建立。

1

战争罪

为了给确定责任、制裁和赔偿提供依据，有必要确定罪行的性质及其程度。就越南战争而言，可以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框架进行评估。正如后文将讨论的那样，与轰炸老挝有关的罪行并不限于战争罪，也不限于越南战争的时间范围。然而，本节将重点讨论越南战争的事件及其与相关国际法的关系。

战争罪一般被定义为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任何行为。所述的一些违法行为包括故意杀人、酷刑和不人道待遇、故意造成巨大痛苦、侵占和破坏财产以及非法驱逐和监禁。自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以来，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必须遵守这一法律，任何违法行为都将受到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2]。

1967年，国际战争罪法庭裁定美国“犯有所有罪行”，因为它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犯下了种族灭绝、使用违禁武器、虐待和杀害俘虏以及强迫平民流离失所等战争罪。值得注意的是，人们非常强调在平民居住的大面积地区使用先进武

器[10]。例如，美国在整个战争中广泛使用了集束炸弹。自2008年以来，根据《集束弹药公约》，这类武器已被禁止，因为它们被认为是“不安全的”：在与敌方部队作战时极其无效，但对平民人口来说却是致命的。⁹事实上，集束炸弹不能针对一个狭小的目标或群体，对混凝土和钢结构及武器造成的损害很小。相反，它们影响的是大部分人口密集地区，目的是“撕开人体的肉体”。¹⁰据估计，从1964年到1973年，美国在东南亚投下了超过750万吨的炸弹。¹¹结果，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领土遭到破坏，其人民不得不面对长期的心理、身体和社会后果。¹²

鉴于这些事实，并根据法庭的裁决，美国于1972年同意分别向北越和南越提供45亿美元和35亿美元。但到了1973年，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最初的一半都不到。此外，这个补偿的条件是维持南北越之间的和平协议。因此，当北越接管南越时，美国趁机完全背弃了对赔偿的承诺，¹³没有就类似的赔偿达成协议，以补偿战争造成的损失和支持柬埔寨和老挝的受害者。

战争遗留物

虽然战争已经正式结束了40多年，但其后果继续影响着老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考虑到美国轰炸任务的长期后果，这一点尤其重要。因此，必须评估未爆弹药和橙剂的发展性影响及其对过去、现在和未来受害者福祉的直接影响。

未爆弹药(UXO)¹⁴

在整个战争期间，老挝是大约580 000次轰炸任务的目标，美国在其领土上投下了2.7亿多枚集束炸弹。然而，超过三分之一的炸弹当时没有爆炸。¹⁵因此，老挝约有40%的领土被称为“炸弹”[1]的危险爆炸装置所污染。¹⁶“炸弹”位于地面上，往往未被发现，但仍在活动，并可因压力和运动的微妙变化而被引爆。¹⁷

在老挝，75%的人口依赖农业活动，这使他们更容易受到与未爆弹药有关事故的影响。据估计，在战后时期，有20,000多名老挝人成为未爆弹药的受害者；其中98%是平民，40%是儿童，60%导致死亡。这相当于世界上已证实的因未爆弹药伤亡人数的一半以上[17]。

未爆弹药还直接阻碍了老挝的发展。事实上，频繁发生的未爆弹药相关伤害严重影响了劳动力。侥幸活下来的未爆弹药受害者由于生产力被认为大大降低，他们在进入工作市场时往往面临大量障碍。未爆弹药的年轻受害者也是如此，他们不得不在学校和社区面临严重的情绪困扰和社会耻辱感[9]。此外，受污染严重的地区通常是贫困程度较高的农村省份。由于与未爆弹药相关的生计活动障碍及其对粮食不安全的影响，这种

情况加剧了社会差距。¹⁸

同样，被污染的土地也不能安全地用于工业目的、旅游、基础设施、运输或教育。这阻碍了经济中所有工业和生产部门的发展，在应对农村地区未爆弹药的发现和事故方面，也妨碍了适当技术和教育的推广[9]。

1996年，老挝政府制定了老挝未爆弹药方案，这是一个旨在协调为农业和社区目的清理受污染地区的国家方案。¹⁹自那时起，更多的监管实体已经建立，销毁未爆弹药的努力也极大增加。²⁰2016年，老挝启动了一个独特的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18“免受未爆弹药伤害的生命”。该项目旨在对举国式努力提供方案支持和监督，以确定未爆弹药污染，清理土地，应对民间发现未爆弹药。²¹过去十年的举措使每年的未爆弹药伤亡人数减少了近85%。然而，从战争结束到现在，只有不到1%的未爆弹药被销毁[17]。毫无疑问，这意味着在今后许多年里，人们将继续因此受苦。

橙剂

除集束炸弹外，美国还在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上空投放了化学炸弹和除草剂。也就是说，从1961年到1971年，美国在东南亚上空投放了7500多万升化学脱叶剂“橙剂”。这就是所谓的“焦土政策”，它试图摧毁越共的农作物、林区和其他粮食供应。²²

1966年，来自匈牙利的联合国代表将除草剂在越南的使用批评为是蓄意违反《日内瓦议定书》。因此，1968年，尼克松总统批准了该议定书，并宣布放弃使用致命的化学品。²³在那时，研究已经表明橙剂中的化学物质对动物胎儿有强毒性。²⁴由于国际压力的升级，1970年，白宫和国防部禁止使用橙剂及其在越南的所有相关军事任务。²⁵

1991年，美国前参议员Tom Daschle发起了一项研究，以发现疾病与接触除草剂（如橙剂）中化学物质之间的联系。现在很清楚，橙剂中的二恶英会引起基因突变，导致严重的先天缺陷。此外，橙剂中的二恶英会持续存在于环境中，污染土壤、水源和食物链。因此，东南亚的新一代将继续遭受该除草剂的致命影响[22]。因此，2015年，退伍军人事务部向美国越战老兵支付了240亿美元的赔偿金。²⁶然而，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尚未获得类似的赔偿。

因此，越南在各种场合寻求援助，并提起诉讼，为受橙剂影响的人寻求赔偿。虽然对孟山都公司、陶氏化学公司和其他生产该除草剂的美国公司的个人诉讼已经成功，但东南亚的受害者还没有得到大规模的赔偿。²⁷

好的一面是，从2012年开始，美国与越南一起努力降低越南境内的污染程度。不过，老挝和

柬埔寨仍一度被再次排除在这种平等关系外[22]。虽然老挝已经收到美国的资金来援助未爆弹药的受害者，但由于接触橙剂而导致的残疾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²⁸ 战争遗留问题项目（WLP）的研究得出结论，在老挝的橙剂喷洒区，有大量的人有先天性出生缺陷和残疾[17]。此外，橙剂还对发育造成了严重的挑战。生活在受污染地区的家庭在战前是自给自足的农民，现在却因农田受到化学污染而遭受极端贫困、饥饿和其他健康问题[28]。还有人指出，由于农村社区缺乏宣传，老挝公民对橙剂及其影响的认知也远低于越南公民[17]。然而，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不足不应使我们轻视橙剂对环境和公共健康的威胁，或忽视解决这一问题的紧迫性。

外交关系和对外援助

上述战争的影响尚未完全解决，并且大部分进展是由老挝国家机构努力取得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老挝战争的影响在国际上越来越引人注目。这为老挝带来了大量外国援助，改善了老挝与美国的政治关系。因此，了解老挝的政治国际关系对于更好地评估过去的互动，并为今后的国际合作和适当赔偿提出一条合理道路至关重要。

美老政治关系

战争结束后，老挝人民革命党取得政权，并于1975年正式成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老挝和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在整个战争期间已经恶化，而当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美国新闻署从该国撤出时，这种关系彻底瓦解。²⁹ 直到1992年，两国的外交关系才得以恢复，当时两国进行了双边合作以调查失踪的美国士兵和战俘[29]。

1993年至2016年，美国平均每年为清除老挝的未爆弹药提供490万美元。尽管如此，老挝从未成为美国的优先考虑对象。事实上，老挝每年收到的平均财政援助相当于美国在整个战争期间每天轰炸老挝所花费的三分之一。³⁰ 此外，所收到的整套援助从未被作为一种赔偿形式，也未收到美国对其军事干预及老挝影响的正式承认。

2016年，奥巴马成为首位承认对老挝轰炸，访问老挝，并加倍提供财政援助，支持清除未爆弹药的在任美国总统。³¹ 虽然这一事件是两国双边关系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但无论是奥巴马还是美国政府，都没有为在老挝执行的军事任务道过歉[5]。

非美国对外援助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老挝也一直是美国以外的各国官方发展援助的接受国。这些年来，

老挝获得的援助也大幅增加，从1984年的人均10.5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70.62美元。目前，老挝官方发展援助的主要来源是中国、日本、韩国、美国和欧盟。毫无疑问，官方发展援助帮助老挝投资了重要的基础设施、发展和人道主义项目，如水坝、经济特区和清除未爆弹药的方案。³²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外国发展援助和融资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如赠款、优惠贷款、私人投资和银行贷款。外债和借贷占老挝政府融资的很大一部分。这种形式的援助每年都有变化，而且愈发涉及税收和较低的优惠水平。³³ 例如，老挝对中国的债务相当于该国GDP的45%左右。由于老挝政府很可能无力偿还债务，有人建议贷款人以减免债务来换取其他地缘政治利益。³⁴ 此外，老挝政府和外国发展伙伴都认识到，由于是官方发展援助，老挝的社会发展并没有像经济数量增长那样成功。³⁵ 这表明，老挝的社会和发展目标与外国投资者的利益之间存在着不平衡。

受害者和赔偿权

虽然老挝得到了美国和其他政府及非政府组织的大量财政援助，这不能等同或混淆于充分的赔偿。老挝的发展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是秘密战争期间所执行军事任务的直接后果。因此，赔偿方案应不仅注重经济赔偿，而且还应通过承认罪行、民事信托和社会团结寻求正义。³⁶ 可以说，从这些理由中任何一条看来，老挝都没有得到足够的赔偿，而这又阻碍了冲突的得当解决。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赔偿的历史背景、赔偿的类别，以及在老挝已经和应该实施赔偿的程度。

赔偿的历史背景

赔偿在战后有很长的历史。例如，德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胜法国后，得到了50亿法郎的“赔偿”。后来，一战结束后，德国最初确定给盟军“300亿美元的赔偿”。³⁷ 然而要直到二战结束，合作而非共存的法律框架才随着联合国的成立而建立。国际法中人权的出现，使赔偿不仅是对于国家，而且对于是个人受害者和群体而言的，在这个前提下，它改变了国家责任的概念。依据此，德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署了一项条约，以向大屠杀的幸存者个人支付赔偿，并向以色列支付国家赔偿[36, p. 392]。

此后，联合国制定了应对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准则。该准则的五个主要组成部分是恢复原状、补偿、康复、满意和保证不重犯。³⁸ 根据这些准则，赔偿方案的主要目标是为受害者伸张正义[36, p. 453]。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五个主要类别中，只有赔偿可以在经济方面得到解决。此外，即使是赔偿，它也提供给

超越经济损失的伤害，包括任何精神、身体和精神伤害。

然而，成功的全面大规模赔偿方案例子很少，甚至几乎没有。这部分是由于联合国相关准则在语言上宽泛而含糊，同时也是由于准则取决于各国的合作意愿。在越南战争背景下，国际合作在整个冷战期间遭到破坏，过渡时期司法向政权稳定转变。由于政治上的限制，越南不得不满足于从未兑现的小规模经济补偿承诺[36, p. 2-3]。另一方面，在老挝秘密战争事件得到承认时，国际上已经接受宽恕和遗忘的政策。

正义与赔偿权

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设立的常设法院，任何违反国际法的行为都需要承担相应责任，这是弥补违法行为这一首要义务的第二项义务[38, p. 5-7]。既然美国被认定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并在越南、柬埔寨、老挝犯下了战争罪，那么，美国就应该向这三个国家以及受害者个人提供“有效救济”。在这一国际立法框架下，美国有责任对在老挝所犯战争罪行造成的恶果进行经济补偿；弥补精神、情感和心理学上的伤害；重建受害者的现状；赔礼道歉；接受司法和行政制裁，以确保相关行为不再发生[36, p. 454]。这一义务不仅是国际法规定的责任，而且在美国国内也被认为是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1973年，尼克松总统的首席外交政策助手称，“在医治印度支那的伤口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开始医治美国的伤口”[24, p. 16]。然而，为了落实联合国赔偿准则，界定受害者应得到什么补充才公平很有必要。然而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方法来界定公平的赔偿。

赔偿的主要原则是“恢复原状”。应对这些挑战的主要原则是“恢复原状”，即完全恢复冲突前的个人和国家状况[36, p. 456-457]。不过，将先前存在的条件设定为目标往往是不可能实现的，并且，在像为秘密战争寻求赔偿这样的追溯性案例中甚至是不可取。这种模棱两可的做法被美国利用为了逃避赔偿责任的依据。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在越南战争后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协助赔偿进程。虽然美国承担了支付赔偿的很大一部分责任，但国际社会可以在支持赔偿努力、提供技术援助和向多边机构施加压力以满足受害者需要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³⁹由于目前的国际赔偿框架没有为国际社会规定具体的作用，这常常被用作不采取行动的借口。为此，联合国建议重新评估国际社会的作用和责任，以指导、加强赔偿进程并使之合法化[36]。

前进

在回顾了驻老挝军事特派团的历史和立法背景之后，我们可以断言应有的赔偿并未被支付。今后的努力必须认识到损害的多面性以及组成全面赔偿方案中的不同个体和国家。为此，本文将根据联合国赔偿准则的五个主要组成部分评估老挝的赔偿进展情况，最后还提出了一些思考和建议。

归还

联合国认为，恢复原状可以理解为恢复自由、享受人权、身份、家庭生活和公民身份、居住地、就业和财产[39]。在老挝，由于未爆弹药的存在，这些方面的进展受到了极大的阻碍。美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已经在与老挝共同努力以解决这一问题。然而，必须加强国家和国际努力以加快清除进程，避免今后出现受害者。

补偿

虽然老挝得到了大量的外国援助，但它从未得到与损失相称的适当经济补偿。国际法院、联合国和其他国家在促使美国重新考量其战争罪行并承诺向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支付赔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康复

老挝制定了为未爆弹药受害者提供康复服务的大规模方案，这些方案的资金主要来自外国援助，特别是美国的援助[39]。然而，战争的其他遗留问题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特别是，橙剂会继续对环境和公众健康构成严重威胁。为了让公民了解其影响，并支持在身体上、经济上和社交上受这一问题影响的人。老挝和美国双方必须合作，两国还必须共同努力来提高这一问题的国际能见度，以确保外国援助也能及时援助这些遭化学污染的受害者。

满意度

毫无疑问，在奥巴马政府期间，美国在承认战争罪行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然而，对为其在整个秘密战争期间的违法行为，美国仍然欠老挝一个道歉。此外，联合国准则还建议通过多边合作以寻求真相。目的应该是寻找失踪者，协助找回和重新埋葬尸体，并纪念他们的逝去[39]。最后，国际法院有责任调查秘密战争事件，并给予司法和行政制裁。

保证不重犯

这一类问题大概是最关涉全球司法的。这是一个广泛的类别，包括体制改革、加强司法程序和独立性，以及促进和保护国际人权[39]。这既涉及到直接有关的国家，也涉及到更广泛的国际社会。

在积极的一面，美国于1971年禁止使用橙剂[25]。世界上在使用集束弹药方面也有改进。在这一领域，集束弹药联盟在禁止使用、生产、转让和储存集束弹药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迄今为止，已有121个国家加入该公约，其中108个国家是缔约国，13个国家是尚未批准的签署国。然而，美国尚未签署该公约，并继续储存着与在老挝使用过的类似的集束弹药[9]。

此外，尽管美国已经签署了《禁雷条约》，但在2020年1月，美国宣布其计划重新授权其军队使用集束弹药。⁴⁰ 为了弥补老挝保证不再复发，美国不仅有责任遵守，而且有责任带头努力使其他国家签署和批准该公约。

总的来说，美国在承认其责任并向老挝及其公民支付全面赔偿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为此，联合国赔偿准则可帮助澄清什么是犯罪行为，并了解受害者应获得赔偿的不同层次。然而，这些准则与确保国家一定会遵守并不是一回事。在促进、支持大规模赔偿与和解进程并使之合法化，以及诉讼和实施制裁方面，国际社会必须重新评估其角色与责任。

参考文献

- [1] Rotondi, Jessica Pearce。为什么老挝被轰炸的次数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历史网，2020-07-11。https://www.history.com/news/laos-most-bombed-country-vietnam-war。
- [2]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日内瓦第四公约》）。1949。转引自Greiff, Pablo de。修复过去：面对奴隶制、种族灭绝和种姓的遗留问题 [Addressing the Past: Reparations for Gross Human Rights Abuses]。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2005。
- [3] Shenoy, Rupa。美国的一场秘密战争如何创造了新一代的美国人，他们改变了外交政策。国际公共广播电台，2016：1。
- [4] Sisavatdy, Saysomphorn。驱逐和老挝美国：是时候醒过来了。Little Laos on the Prairie, 2018：1。
- [5] Andelman, David A。老挝人抢劫美国人的建筑。纽约时报，1975：3。
- [6] 老挝：巴拉克-奥巴马对“史上最大的轰炸”表示遗憾。BBC新闻，2016-09-07。<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37286520>。
- [7] Convery, Padraic。越战50年后，美国炸弹继续在老挝杀人。AL JAZEERA NEWS, 2018：1
- [8] Kurlantzick, Joshua。A Great Place to Have

War: America in Laos and the Birth of Military CIA. A Great Place to Have War: America in Laos and the Birth of a Military CIA.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7: 245-255。

- [9] 联合国。集束弹药公约。都柏林，2008：39。
- [10] Foster, Cody J。美国在越南犯了战争罪吗？[Did America Commit War Crimes in Vietnam?]。纽约时报，2017-12-01。
- [11] Hikosaka, Shawn。携手解决越南战争遗留问题。美国国务院，2019。
- [12] Michael Hart。在老挝，美国炸弹的幸存者重建他们的生活和肢体。东南环球通讯有限公司，2020：1。
- [13] Langguth, A. J。被遗忘的对越南的债务。纽约时报，2000。
- [14] 在老挝上空投下的弹药包括化学炸弹、通用炸弹和集束炸弹。后一种炸弹在到达地面之前就会爆炸，释放并散布数百枚“炸弹”。“炸弹”被设计成数百个锋利的刀片状碎片，撕裂人体。由于集束炸弹散布在大面积地区，它们经常没有击中军事目标，而杀死的大多是平民（《战争遗产》）。
- [15] 瑞士发展与合作署。隐藏的危险：揭开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未爆弹药问题。亚洲简报，2014。
- [16] Shi, Yinglun。老挝将清理9万公顷受未爆弹药污染的土地 [Laos to clear 90, 000 hectares of land contaminated with UXO]。新华网：2019-07-29。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9-07/29/c_138267566.htm。
- [17] 战争遗产。集束弹药。2011。http://legaciesofwar.org/about-laos/cluster-munitions。
- [18] Soulineyadeth, Sopa。未爆弹药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Xiengkhouang省农村社区生计的影响 [Impact of Unexploded Ordnance (UXO) on Rural Communities' Livelihoods]。惠灵顿：惠灵顿大学，2014。
- [19] 国家农村发展和消除贫困委员会。老挝国家未爆弹药方案(UXO LAO)。2020-08。https://www.uxolao.org。
- [20] 2006年，成立了未爆弹药和排雷行动国家管理局，作为未爆弹药部门的协调机构。该实体对于制定诸如“安全前进之路二”、未爆弹药国家战略计划等政策至关重要（联合国）。
- [21] 开发署。迈向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8：消除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发展的未爆弹药障碍。2020-08。
- [22] Christina Lin。越南寻求美国对化学橘剂的赔偿。亚洲时报，2018-08-31。https://asiatimes.com/2018/08/vietnam-seeks-us-reparations-for-the-chemical-agent-orange。

[23]然而，尼克松总统的承诺是建立在橙剂是安全的这一不正确的前提下的，而且也没有禁止使用凝固汽油弹--用于燃烧弹和炸弹的燃料 (Biggs)。同样，它也没有禁止使用凝固汽油弹 --- 用于燃烧手榴弹和炸弹的燃料 (Biggs)。

[24] Biggs, David。越南:化学战争。纽约时报, 2017。

[25] Aspeninstitute。什么是橙剂?。2012-08。 <https://www.aspeninstitute.org/programs/agent-orange-in-vietnam-program/what-is-agent-orange>。

[26] Nicole F. Roberts。令人震惊的橙剂健康影响现在是军队死亡的遗产 [The Shocking Health Effects Of Agent Orange Now A Legacy Of Military Death]。Forbes, 2018-05-28。 <https://www.forbes.com/sites/nicolefisher/2018/05/28/the-shocking-health-effects-of-agent-orange-now-a-legacy-of-military-death/#21b2f62e21c6>

[27] Khanh Lynh。越南指向美国法院判决，要求孟山都赔偿橙剂 [Vietnam points to US court verdict, demands Agent Orange compensation from Monsanto]。VNExpress, 2019-03-29。

[28] Chagnon, Jacqui。奥巴马访问老挝提供了解决橙剂遗留问题的机会。Cogit Asia, 2016-09-05。 <https://www.cogitasia.com/obama-visit-to-laos-offers-opportunity-to-address-agent-orange-legacy>。

[29] Thayer, Carlyle A。美国-老挝安全关系: 跨国威胁合作。Washington D. C: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2005: 6-7。

[30] 比较是以2013年美元为单位 (战争遗产)。

[31]美国驻老挝大使馆。President Obama Announces Doubling of UXO Assistance to Lao PDR。2016-09-07。 <https://la.usembassy.gov/presidentobamaannouncesdoubling-uxoassistancelaopdr>。

[32] Dolven, Ben and Thomas Lum。Laos。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8-12-18。 <https://fas.org/sgp/crs/row/IF10236.pdf>。

[33] 优惠水平是衡量信贷的相对“软度”，反映借款人相对于贷款市场利率的利益 (计划和投资部, 国际合作司, 92)。这类援助通常针对国内生产总值低、调动其他资源的能力下降的最不发达国家。由于老挝最近达到了从最不发达国家地位毕业的标准, 有人担心, 转向非优惠融资可能会危及该国的发展进步(联合国)。

[34] 债务负担上升可能使老挝更加依赖中国。VOA新闻, 2020-06-08。

[35]计划和投资部, 国际合作司。老挝第八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发展融

资。A DEVELOPMENT FINANCE AND AID ASSESSMENT, 2016

[36] Greiff, Pablo de。修复过去: 面对奴隶制、种族灭绝和种姓的遗留问题。 [Addressing the Past: Reparations for Gross Human Rights Abuses]。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2005。39。

[37] Turgeon, Lyn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parations。New German Critique 1973 (1) : 112-115。

[38]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冲突后国家赔偿方案的法治工具。日内瓦: United Nations, 2008。

[39]老挝OPE。Blind and missing both-hands, bombing life in Laos - Legacies of War。COPE, 2016-09-16。 <http://copelaos.org/news-and-announcements/blind-and-missing-both-hands-bombing-life-in-laos>。

[40] Broom, Douglas。世界经济论坛, 2020-04-03。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9/10/global-landmine-stockpiles>。

将论文提交给IUCJ

issue-2-theme.txt

认同与认知

中美联合期刊第二期开始征稿。

期刊将于2021年六月发布。本期主题为认同与认知，我们同时也接收关于中美两国关系以及两国国内事务的论文。征稿结果将会根据论文提交的时间滚动发布。

issue-1-cover.psd

中美国际期刊

IUC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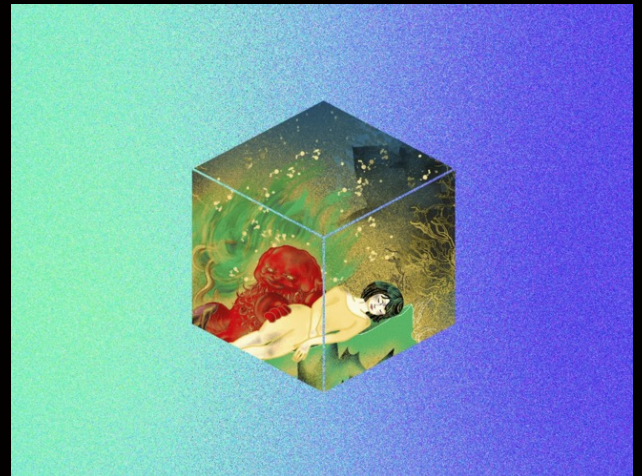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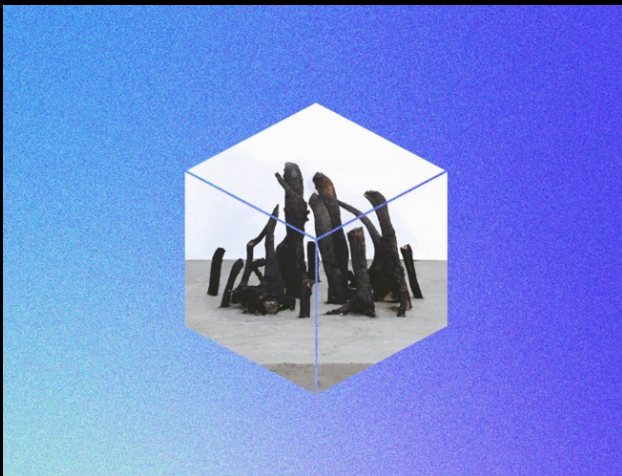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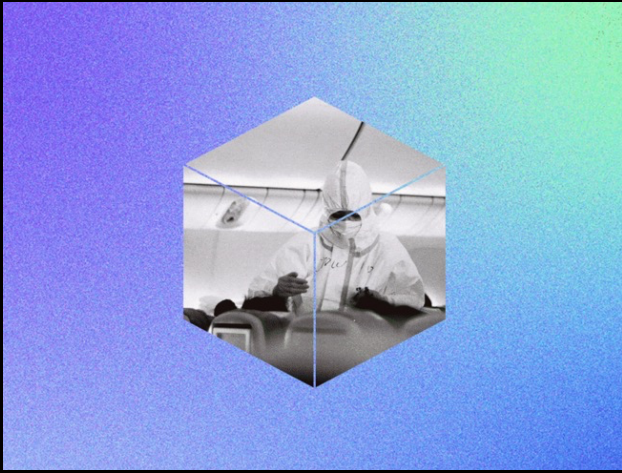
中美能源贸易

Implic

相互依2020 冬
第一期

UCBRC presents

Home is...?



“Now, when I am writing these words, it strikes me that where I am has turned into a heterotopia—I am writing at home, where I have been self-isolating over several weeks, the usual, familiar setting becomes an estranged, crisis “other” space, and the same quiet, invisible transformation has happened to many homes, hotel rooms, hospitals, cruisers that are not allowed to reach shores, and cities that are shut down, countries that close doors to the outside, and even the entire planet that looks differently now that human activities are greatly reduced, and atmosphere, climate as well as ecosystems have quietly changed.”

— — Mingwei Song, *The Fear of Seeing* (forthcoming)

While the *IUCJ* is an academic research journal above all else, we have decided to include featured work from the U.S.-China Better Relations Coalition’s November art exhibit, *Home Is...?* We believe doing so not only supports the efforts of our parent organization, but also demonstrates the undeniably multidisciplinary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uring this turbulent and isolated time through which we are living, we hope that the following cultural abstractions of home can serve as reminders of the difference in cultures and associations of home that lie at the root of our studies. The full exhibit is available at betterrelations.org/home-is.



Zyra Zhang
Habitat, 2020
Digital Art

I built this imaginary space with certain elements to represent [my] personal impression of [my] hometown Yuyao. I was conside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yself and home when staying abroad alone during the quarantine period. This piece, however, brings up my redefinition of home because the instability of modern migration, overseas study, the epidemic condition of this year, and other factors have already impacted the conventional concept of home. It becomes a faith instead of a place or a room where I actually live. Then I rendered the image with free-willed lines and color variations. Such existing space in my brain has transformed realistic landscape into a fantastical, peaceful habitat, in which the sense of belonging can settle my mind.



Xiao Sun 孙晓

My Hometown—Daliang Mountains of Sichuan series, 2019-2020

Acrylic on paper

As a child born and raised under the nurture of the culture in Liangshan, I feel the urge to pick up my brush for my hometown, the 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It sit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Yunnan and Sichuan and is home to a large population of the Yi people (彝族), along with other ethnic minority groups in China. It also has one of the four spaceports in China.

The people of my hometown are kind, friendly, hospitable, and enthusiastic. They greet friends and guests with their best cuisine, play the Moon Lute at gatherings, and invite visitors to sing, drink and celebrate the wondrous night.

Impressions of the Torch Festival of the Yi, the New Year Festival (阔时节) of the Lisu (傈僳族), and the spaceport are engraved deep in my mind. Black, red, and yellow are the three main colors used by the Yi in their traditional garments and lacquerware. In Yi's culture, black is the earth's color, representing solemnity; red is the color of bravery and passion; and yellow is the color of light and aspirations for the future. I use these colors and totems as an artistic representation to depict my hometown.





“Home” is an uncountable noun. A place where cars could hardly pass—this was my only impression of Beijing’s hutong. Not until I took a thorough walk did I realize how miraculous it is. Under a narrow ray of sky, every aspect of the lives of residents is displayed. The tiny, obscure zone has been the home of several generations, and it is impossible to know the exact number of residents. Aged trees, paint-shedding walls, outdated decorations—they are the carriers of history, recording the lives of each generation. Unfortunately, many hutongs, the “home” of countless people in history and present, are to be demolished and replaced by modern architectures. All the traces will be erased in reality, so let’s not abandon the “home” in memory.



Ruowei Gong
Home is an Uncountable Noun, 2018-2019
Photo collage

中美校际期刊

IUCJ



2020 冬
第一期